

目 錄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副總書記 約多對本書的介紹	5
一 喀喇崙的一件小事	11
二 殖民主義還沒有消亡	18
三 橫越爪哇島	27
四 村莊	49
五 文諾沙里的人民瀕於死亡	57
六 爭奪蘇門答臘的鬥爭	65
七 中國的面目	75
八 火山沒有熄滅	79
九 和阿末的會見	93
十 荷蘭人——朋友與敵人	103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副總書記 約多對本書的介紹

兩位荷蘭人來到了印度尼西亞。這件事有什麼特殊之處呢？幾世紀來，荷蘭人到印度尼西亞來；直到今天，成萬的荷蘭人仍舊在旅館、公司以及政府各部中担任他們的職務。然而這兩位荷蘭人的來到印度尼西亞是有着特別的地方。他們的名字叫考爾·裴，斯與約普·沃爾伏。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是來這裏出席印度尼西亞總工會（印度尼西亞工會聯盟的中央組織）的全國大會的。他們回荷蘭時不但帶着印度尼西亞工人的許多禮物，而且也帶去了這個他們稱爲“千島之國”的熱烈同情和團結。

沃爾伏的這本書就名爲“千島之國”，由阿姆斯特丹的“彼加蘇斯”出版公司出版的。荷蘭人撰述關於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經歷的著作已不在少數，近來還是很多。然而沃爾伏這本書和安妮·洛明—凡斯柯博士所寫的名爲“旁觀者”一書是很不相同的。後者充滿着文學風格和小說體裁，而很少談到社會生活。“千島之國”尤其是和范勃蘭根斯坦因博士所寫的“今日印度尼西亞”一書不同；在“今日印度尼西亞”這本書中充滿着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憎恨。更不用說比“今日印度尼西亞”可能更惡劣的弗朗斯·古德哈特所寫的那本書了。

安妮·洛明—凡斯柯以“旁觀者”爲她的書名。這書名

應該給予約普·沃爾伏所寫的這本書的；沃爾伏的確是用一個朋友的眼光來觀察印度尼西亞的情況，他心神貫注地去體驗印度尼西亞的情況，而且對它感到十分痛心。

在前面幾頁上他就寫道：“要把雅加達——或者整個印度尼西亞——寫得令人相信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要證明‘難以置信’的事情是真實的，這是不容易的。你必須親眼看到它，你必須親自和那裏的人談話。讀者也許會這樣責難地說：是的，但是這一切都是黑與白，都是極端！這是對的。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是黑與白，是極端。無限的貧困和無限的財富。這就是所有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典型圖畫。”

他在宋蒙地安廣場——從前有范赫茲的塑像的范赫茲廣場——的周圍散步：“但是就在范赫茲像從台基上倒下的地方，好幾十個人躺在那裏睡覺，男人、女人和小孩……”

他從雅加達乘火車周遊了爪哇島後說：“這裏周圍整個的氣氛是安靜的；人們都感覺到印度尼西亞無可估量的富饒。什麼東西都生長。這裏，在地面上或地底下，可以找到人們需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之一。但是，當我們進入老百姓居住的村莊和鄉村時，我們都為他們的貧困所感動。在地球上最高饒的一個國家裏住着一個最貧窮的民族。這是殖民主義的反常的對照。這種對照支配着這裏的一切政治生活。”他的結論是：“荷蘭帝國主義仍舊統治着印度尼西亞。”“對他們說來，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喪失擁有八千萬居民的印度尼西亞對於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勢力將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作者描寫工人的困苦說：“印度尼西亞的失業人數正與時俱增。”

關於農民，書中寫道：“幾乎所有的農民都負着重債，因此，他們的手腳牢牢地受着高利貸者和地主的束縛。”所有這一切都是沃爾伏稱之為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傳統的最大敵人”荷蘭帝國主義造成的。他又說，荷蘭帝國主義的勢力不但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存在着，而且也存在於文化方面：“文化合作基金會……想強使印度尼西亞作家和藝術家聽從命令。”並且說：“一向在萊登大學研究殖民主義方法的教授們被派到印度尼西亞的大學中去講課。”“存在主義和其他腐朽的哲學也被傳授給印度尼西亞的藝術家。”

關於新畿內亞（伊里安），他寫道：“那些曾經燒殺印度尼西亞人民、焚毀村莊和鄉村、曾經用希特勒式的濫炸殺害印度尼西亞婦孺的人們，現在對於這個巴布亞（伊里安的別名——譯者）嬰兒的命運忽然擔心起來。……但是，……從前，帝姑島是曾經拘禁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的集中營……的地方，現在他們企圖在那裏建築一個防禦印度尼西亞人民解放運動的堤壩。”

但是如果沃爾伏的這種調查只是根據令人沮喪的事實的話，那他就不能代表荷蘭的進步人士。事實上不是的！他看到了，而且也的確相信正在成長中的積極力量。他到過日惹的饑饉地區——文諾沙里。他看到了過着實在不是人的生活孩子們。他看到了窮困和受苦。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是生氣勃勃的。他們笑、作鬼臉、團團轉地跳着。他們是非常可愛的孩子。”

他又說：“文諾沙里城是貧困的典型。但是在大街兩旁的兩幢東倒西歪的房子中間橫掛着一條大標語：‘工會聯合會萬歲！荷蘭工會聯合會萬歲！印度尼西亞總工會萬歲！’其中一幢房子外面掛着一面紅旗……。”

他從雅加達乘火車到泗水去，他在沿路每一個車站上受到了一大羣人——不只是工會會員或鐵路工人——的歡呼，他稱這次的旅行是一次“偉大的勝利”。在新埠頭車站，人們被禁止舉行示威，於是有人輕輕地對他說：“他們禁止我們攜帶紅旗，但是我們把紅旗攜帶在心裏。”他對這件事受到感動。

他敘述了在茉莉芬挑釁事件期間印度尼西亞總工會怎樣受到了鎮壓，但是結果是印度尼西亞總工會却再度迅速地、大大地發展了：該會現有會員二百五十萬人。他寫道：“這是帝國主義者由茉莉芬挑釁事件所獲得的悲慘結果。”

他談到帝國主義者聽到了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名字怎樣發抖，談到印度尼西亞總工會是“一個羣衆性組織，很少的國家可以找到像它那樣的組織”，他接着指出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遠景：“那時紅白色的國旗將在羣島上空自由地飄揚，印度尼西亞人民將建立一種新的生活。這些日子是不遠了。”

他作出了這個結論是因為：“許多人不能了解‘八月革命’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覺醒帶起的影響。……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全部思想都已革命化了。”

在作出了“荷蘭帝國主義……的基礎已在動搖”的結論以後，他在結束這本傑作時說：“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偉大的民族。……它什麼時候才獲得自由呢？”

從沃爾伏這本書中可以證明：在荷蘭，不但有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朋友，而且這些朋友是頭腦清醒的、堅強的。他也知道關於印度尼西亞的政治上敵人的實際情況：“回教國運動是一個狂熱的反動集團，它僞稱要建立一個回教國家。它和封建地主的政黨——瑪斯友美黨——有密切關係。”

他談到沙里爾說：“沙里爾的政治生涯的一大部分是用在對付青年的鬥爭上。爲了要求青年不要太猛進，並使他們的革命熱忱和志氣消沉下去，他寫了‘我們的鬥爭’一本小冊子。當這些小冊子還顯得不够的時候，茉莉芬挑釁事件就發生了……”

所以沃爾伏的這本書雖然不能說是對於印度尼西亞情況的一種研究，而它對荷蘭讀者來說是很有用處的，因爲它對目前印度尼西亞的生活的若干方面作了淺顯和生動的敘述。這本書像一篇遊記，但是正因爲它的淺顯而生動，它將有助於荷蘭人民對印度尼西亞的了解，並進而加強他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團結。

關於這本書的內容以及書中的樂觀的看法，我們還可以寫一些。但是還是你們自己去閱讀來得好。

最後還應該向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作了重大貢獻的約普·沃爾伏表示敬意；印度尼西亞人民是知道怎樣去感謝這種重大的貢獻的。

（原載 1954 年 2 月 27 日雅加達“人民日報”）

Main body of the page is blank

一 喀喇蚩的一件小事

當我們抵達喀喇蚩機場的時候，我們看上去都帶着病容。

一小羣旅客擠在棕色的三摺門的前面，門上有一塊佈告，上面寫着：“體格檢查”。這批二十四小時前精神煥發地乘上“夫拉阿汀根”號飛機的旅客，現在看起來都面色蒼白和疲憊不堪了。

這是第一百次我們出示我們的證明文件來加蓋驗印。我們等待着，等待是飛行途中的唯一調劑節目。

我們在衛生站前面的一條小走廊上徘徊着。人聲很嘈雜。有一家人爲了掉在飛機上的一個皮包而在吵鬧着。他們逢人就說這件倒霉事。有的人在談論昨晚那位英國婦人的嬰兒吵得我們一夜沒有睡，嬰兒的聲音和飛機的四個引擎的聲音打成了一片。時刻都有人在喊熱，真熱極了。熱得令人難以忍受。該是穿熱帶服裝的時候了。

我們深深感覺到，喀喇蚩的人一定是非常關切外來旅客的健康的。下飛機以前，衛生站的一位官員爲我們噴射了“弗立特”殺蟲劑。我們始終不十分了解這是爲什麼，但是這似乎是命令——命令是更重要的。

然後，衛生站檢驗了我們的體格檢查證。證書上必須列有這一切可怕的疾病——霍亂、傷寒、痢疾……——的免疫

證明。少一條也不行。

我們一個一個地走進小屋子，屋內坐着衛生檢查員。

站在我們後面行列裏的一個高級英國官員突然大發雷霆起來。他的通紅的臉變得發紫。他以急促的脚步離開了行列，走到前面，手裏拿着一架柯達照相機和一個小皮包。

“我要見衛生檢查員，我沒有時間再等了……”

一直像銅像似地站在一旁的巴基斯坦警察這時欠了欠身表示歉意：旅客很多，不能不一個挨一個檢查。

“衛生檢查員……”聽起來好像是命令的口吻。

同行的旅客伸長了頸子瞧着。吵架嗎？有些人的臉上似乎在說：“哈哈！吵起架來了！”

大家都不說話。那個英國人重複地、一字咬一字地說：“我要見衛生檢查員。”同時他準備闖進去。棕色臉孔的警察想向他解釋，勸他等一下。他用肩膀一推就把警察推開了。

就在這時候，門開了，衛生檢查員走了出來。顯然吵鬧聲使他感到有些吃驚。

他彬彬有禮地對着那個頑固的英國人說：“說正經話，您得等一會兒。如果您是一位紳士的話，請耐心一些……。”

這個說英國話的火藥筒馬上改變戰術。

“我反對你們這樣做。我不願意讓這種東西得罪我，抓住我不放……。”他肥短的手指指着棕色臉孔的警察，警察站在門邊，和以前一樣地恭恭敬敬。英國人硬說警察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推到一邊去。這個有色人！

人人都聽到了這個謊話，但誰也不說什麼。警察無動於衷地站在那兒。旅客們不做一聲，只是向前望着。像這種事情似乎是少管為妙。

過了一會兒，那個英國人對那個警察輕蔑地看了幾眼，

悄悄地走開了。

人們又重新談起不聽話的嬰兒和炎熱的天氣了。又過了一會兒，整個事情似乎也給忘掉了。

的確這只是一件小事。也許每天有近百件這樣的事情發生。報紙上不會登載這樣的事情，而且各國政府間也不會爲了這些事情交換照會。但是對我們來說，這是我們第一次碰到的一個新問題。它是我們在以後幾個月內將訪問的國家的主要問題之一。這場小小的爭吵，這個英國官員的行爲，使我們看到了對東方國家的人民與種族的歧視問題。也就是說，殖民主義問題。後來，在我們訪問印度尼西亞的旅程中，我們不時碰到像在喀喇蚩發生的那種事情。

夜幕籠罩着喀喇蚩。體檢以後，我們只剩下一些可以喝一杯清咖啡，吃一點東西的時間。

一輛大汽車飛快地把我們送到一家飯館，又飛快地把我們送回機場。外面是一片漆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只看到站在機場前面的路燈的微弱燈光下的幾個乞丐和路旁的棕樹的輪廓。

唯一打破這夜晚沉寂的就是起飛和降落的飛機的馬達轉動聲和蟋蟀不斷的叫聲。誰也不懂這些褐色的小動物怎樣能發出這種聲音，而且還能不停地繼續這樣久。它們似乎是成千成萬地……。

“夫拉阿汀根”的馬達又在全力轉動了。我們扣緊了皮帶。飛機震動了幾下，離開了地面。我們以每小時400多公里的速率向目的地飛去。無需向外面張望；我們要到天亮才能飛到。

有人認爲飛行是一件難受的事情，也有人認爲很有趣。這兩種說法都對：有時會感到興奮，有時却只想睡覺。在飛

過中東廣闊的土地的幾千公里路程中，我們沒有看到什麼。我們在 2,000 公尺的高空飛着，時常什麼也看不清楚。例如在我們記憶中的埃及只是無窮無盡的沙漠，巨大的棕黃色的斑點，從天空看下來好像是年深月久的破舊的鑲木地板。清晨的時候我們到達了開羅。初看起來，開羅機場和所有其他的機場一樣，但是那裏有着森嚴的軍警戒備。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出口，都站有警衛。若要通過一個過道，一扇門，就必然要受到士兵的銳利眼光的注視。大廳裏法魯克的像已經由納吉布的像代替了。

除了我們從幾千公尺的上空看見的大片沙漠以外，我們所看到的埃及就只是這些了。沙漠，沙漠，還是沙漠。這樣過了好幾小時。

只有一次，一幅美麗的圖畫打破了沙漠的單調。我們飛到伊拉克的上空。飛機愈飛愈低，速度開始慢了。馬上就要降落。在我們的下面是一條廣闊的河流，幼發拉底河。我們就要在巴格達附近降落。

一幅美麗的圖畫展開在我們的面前，富饒的稻田、雄偉的棕樹、白色的回教堂，與一望無際的菜園相映生輝。這是一幅難忘的情景。這是我們在已經經過的那段旅程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現在，這段路程已經留在我們的後面了。

飛機馬達單調的轉動聲使人有些麻木的感覺。拿起一本書來看，但是一下子就想別的了，想睡覺最多也只能打個小盹。從喀喇崙到曼谷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尤其是在夜裏。

英國婦人的嬰孩沒有哭鬧。顯然她要留些力氣在今天晚上再哭鬧一番。大多數的旅客都在向前觀望。其中有幾個是重要的荷蘭官員、商人和荷蘭公司的高級職員，他們還在

掠奪這個美麗的赤道國家的富源。

他們談論“黑孩子”（指印度尼西亞人），他們譏笑印度尼西亞工人的工會，他們抱怨現在一切都比以前困難。但是同時他們很明白，雖然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愈來愈大的抵抗使情況日益困難，但他們仍然掌握着一切。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這樣，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公然出面，而是用一種轉彎抹角的方法。

一位旅客問我們：“到了雅加達，公司會有人來接你們嗎？”這是一位與一個荷蘭大企業有關的婦人，她經常來往於阿姆斯特丹與雅加達之間。她似乎認為凡到印度尼西亞去的人一定是受雇於外國企業的。印度尼西亞仍然是外國企業，尤其是荷蘭企業的領域，這些企業都從那裏榨取豐厚的利潤。

當然我們不能不使那個婦人感到失望，但是對許多其他的旅客來說，這個問題是很合乎人情的。

在旅客中沒有一個印度尼西亞人。每天到雅加達的飛機主要是裝載着大托拉斯的高級職員和政府官員。這些政府官員的職責是在保護外國企業的利益，而他們也常常把這種職責當做他們至高無上的聖訓。

因此我們成了荷蘭人常說的這種水裏的怪鴨子了。

現在將近半夜一點鐘了。除了幾盞看書用的小燈以外，燈光都熄滅了；我們都想睡一會兒。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雲上的日出真是奇觀——我們感到更疲倦了，但同時也很輕鬆愉快，因為我們愈來愈接近最後的目的地了。在仰光，我們停留了很短的時候，喝了令人不敢恭維的咖喱湯，湯到了胃裏像火燒一樣。我們繼續向曼谷飛去。這是到雅加達以前的最後一個停留地點了。

在曼谷我們下了飛機踏實地睡了一夜。

但是我們還先進城玩了一會兒。航空公司的大汽車載着我們到處遊覽。陸軍部、王宮、兵營；曼谷最熱鬧的市區、市場……。一個身穿荷蘭皇家航空公司制服的女郎盡她的最大努力用拙劣的英語告訴我們路上經過的一切。

住宅區與街頭景象不在遊覽範圍之列，因此車子疾馳而過。但是我們還是看到了幾眼。

曼谷看上去像一個大蜂窩，成千上萬的人住在這裏。在進城的路上我們看到許多木房子。在混濁的小河上，停泊着許多葦草篷的小船，全家大小都住在船上。許多小孩光着身子在街上到處亂跑，向行人乞討。在一所破草棚的旁邊豎立着一塊大廣告牌，晚上有電燈照着，廣告牌上寫着可口可樂是如何的怡神開胃，以及英國收音機可以收聽所有的電台。這是一種諷刺性的對比，既可笑又可悲。

人們半裸着身子或是穿着破爛的衣服走來走去。在一小時內，我們看到了在平時不見的貧窮。我們看到了殖民地國家中城市的形象。這對我們以後在印度尼西亞將看到的一切是一種準備，一個序幕。

我們走馬觀花地看到了曼谷居民的貧困，也看到了泰國的國王。國王乘着一輛敞篷的汽車晚間出遊，周圍有一大羣騎着機器腳踏車的軍警保護着，沒有人向國王招呼。林蔭道上幾乎什麼也沒有了；在大街上，人們和平時一樣地靜靜地走着。沒有人向國王招手，或歡呼，或者甚至轉過身子來看一看。國王的車隊繼續前進，吹着喇叭，但是誰也不去注意它。

我們也繼續前進。我脫了鞋只穿着襪子在一所大廟中走了一圈——那裏是不准穿鞋的——，仔細地看了看一

尊大佛的銅眼，最後我們又回到了機場附近的旅館裏。

似乎泰國的所有青蛙和所有的其他嘎嘎作聲的蟲豸都集中在旅館的週圍了。整整一夜，嘎嘎之聲就沒有停過。

在我們的臥室中，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壁虎，在天花板和牆上竄來竄去找東西吃。至少對人說來，它們是無害的，但對蚊子、蒼蠅和其他昆蟲就不一樣了。有時它們停住好久不動，好像呆了一樣，瞪着狡猾的眼睛四下探望。然後，它們突然向目的物撲去。它們是安靜有益的良伴，從此以後我們每天都要和它們見面。

自曼谷往雅加達，我們踏上了最後的一段路程。往下一看，樹木茂盛的平原和丘陵已經由藍色的海洋代替了。幾小時以內，我們就要到達印度尼西亞。對於這個陌生而遙遠的國家——現在已很近了——的一種說不出的盼望心情湧上了我們的心頭。陌生嗎？並不盡然。它曾是政治鬥爭中的賭注。我們看過很多關於印度尼西亞的書，也常和印度尼西亞朋友作深夜的長談，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親眼看過這個國家。現在我們有機會看到了！

飛機擺動了一下。我們又在陸地的上空了，下面是一塊綠色的花氈，一大片熱帶原始森林。有人在說：“這是蘇門答臘巨港的附近。”這是印度尼西亞最富饒的地區之一，也是在印度尼西亞的外國資本的命脈之一。

然後又是海洋。成千的島嶼像一條保護帶一樣地羅列在爪哇的海岸前面。我們直向雅加達飛去。

飛機開始下降了一些。我們的右方是一個熱鬧的港口丹絨不錄。

我們最後一次繫上了皮帶。我們要着陸了。……

梯子推到了飛機旁邊，機艙的門打開了。又濕又熱的風

吹在我們的臉上。月台上人們在招手。他們是我們的主人，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理事會的理事們。他們拿着鮮花在迎接我們。這就是我們的公司。……我們握手，我們為彼此之間的這種堅強友誼感到高興。我們到印度尼西亞來就是要加強這種友誼。

我們聽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比埃好嗎？”——比埃·范斯泰凡蘭；由於這位荷蘭青年與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團結，他被判了七年徒刑（被拘禁在荷蘭北部的萊華登）。他現在還在監獄裏，但是他的印度尼西亞朋友並沒有忘記他。

致了歡迎詞，獻了花。攝影記者也照了相，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機場外面，有一大羣朋友在等着我們，穿着工作服的機場工作人員、婦女、青年、工會代表、政黨和其他組織的代表。

一個穿着制服的印度尼西亞人把頭湊過來對我們笑着用荷蘭話說：“我是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會員。幾乎所有的海關職員都是我們的會員。印度尼西亞總工會頂好。荷蘭工會聯合會頂好！”

我們的行李毫無阻攔地通過了海關，我們很快就把事辦完了。

然後我們走出飛機場，和印度尼西亞的朋友們見面。

二 殖民主義還沒有消亡

在我們旅館的小房間裏，空氣熱得悶人。溫度計——我們牆上的唯一裝飾品——上的水銀指着華氏 87 度，時間已經是近黃昏了。

對我們這些習慣於荷屬天氣的人說來，這真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尤其是第二天。熱氣使人有一種昏昏沉沉的感覺，好像老是背着重擔似的，什麼東西都是濕濕黏黏的。

我們的印度尼西亞朋友對我們非常照顧，他們說：“你們至少一天得洗兩次澡。”印度尼西亞人自己也是一天洗幾次澡的——至少在他們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在熱帶，這是唯一可以保持身體正常的辦法。因此，我們慢慢地也就習慣於走到院子中的小木屋裏，用小瓢從大桶裏取水往身上澆。“MANDI”——洗澡，是我們學會說的第一個印度尼西亞字。

使雅加達的空氣這樣悶人的不只是因為天氣熱。那裏的平均溫度是 85 度，最高到 97 度。最重要的因素是雅加達附近地區的高濕度，因為雅加達地勢低窪而且近海，那裏的濕度就比許多其他城市還高。然而，熱帶的熱度和水量是一種寶貴的結合，它給了自然最好的發展機會，它對農業非常有利並給這個美麗的國家極大的發展機會。它也許是印度尼西亞最有價值的寶藏了……

路上車輛行人來往的聲音傳到了我們旅館的房間裏，這房間是我們在以後幾個星期中的大本營。嘈雜的聲音吸引我們走出門去。我們和幾位印度尼西亞工會運動方面的朋友一起，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亞首都的街道上去散步。

雅加達有着悠久而多難的歷史。好幾百年以前，荷蘭商人和他們的僱傭軍把雅加達變為他們向印度尼西亞富饒的土地入侵的港口。他們把它當作一個基地，以便將他們的殖民地壓迫制度擴展到全爪哇和其他的印度尼西亞島嶼上去。想在遠東國家進行掠奪的荷蘭商人的巨大聯盟——東

印度公司的第一個堡壘就設在爪哇的萬丹。萬丹對東印度公司是有用的，但是不適用於作為進而控制全部印度尼西亞羣島之用。這就是為什麼讓·比埃特松·康恩在1619年5月30日征服雅加達的原因。這個被荷蘭資產階級所讚揚的英勇行為是由於陰謀詭計的結果。它是對一個幾乎毫無防禦的村落的卑鄙的出其不意的進攻，整個村落被“勝利地”燒毀了。那個廢墟和後來新蓋的城堡被命名為巴達維亞——荷蘭商人統治的標誌。荷蘭商人無惡不作，只要是與東印度公司利益有關，他們決不放過任何人和任何東西。但是在後來的幾世紀中，雅加達也被作為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基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荷蘭和其他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又重新把雅加達作為入侵的港口，藉以重新控制廣大的垂涎已久的土地。荷蘭的資本家和他們的僕從政府締結林芽椰蒂協定，並不是為了謀求和平解決，而是為了取得一個喘息的時間，藉以把荷蘭軍隊運到印度尼西亞來。一個月後，巨大的軍事力量又集中在雅加達及其周圍，雅加達成了反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所要求的自由的橋頭堡。雅加達成為對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控制下的領土進行侵略的港口。在那裏，范穆克以政府的名義發動了殖民戰爭，坦克從那裏開入內地，荷蘭軍隊在貝爾和德里斯^①命令下開始了殖民軍事行動。

在過去，在執行帝國主義計劃時，雅加達一直佔着很重要的位置，現在還是這樣。它是許多奉行殖民主義剝削政策的外國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總部。大企業大半都在雅加達設有總辦事處。它已經成為大宗貿易與官僚政治的中心，它

^① 貝爾係荷蘭政府副首相，德里斯為首相。——譯者

與爪哇的其他領土有良好的聯系，它是運輸與交通的樞紐。由於丹絨不錄港的重要位置，雅加達在控制印度尼西亞領海以及許多其他印度尼西亞島嶼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這些島嶼對於外國企業常常仍是不安定的來源。雅加達是殖民主義蛛網的中心，這個網包括了整個廣闊的島國，雖然到處都是支離破碎，但是仍然絞竭盡全力地保持在一起。

在市中心區，我們看到了皇家殼牌石油公司、荷蘭皇家輪船公司和荷蘭貿易公司的豪華的大廈。巍峨的白色建築，十分富麗堂皇。而真正的政府大廈（像蘇加諾的大廈，過去“總督”曾經在那裏臨時住過）雖然也不算壞，但比較起來却顯得遜色。

殖民主義一直主宰着這個城市，現在仍是這樣。這是事實。但是也就在這裏，在最沉重的壓力下，印度尼西亞人民反抗了殖民主義的壓迫，而且他們已設法組織起來。雅加達的歷史不僅是殖民主義陰謀與外國暴政壓迫的歷史，而且也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為獨立與自由而鬥爭的歷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印度尼西亞工人在這裏組織了他們的第一批工會。為爭取國家獨立而鬥爭的各政黨，不顧荷蘭政治情報處的挑釁，開展了它們的活動。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殖民軍隊的鎮壓，但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以頑強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恢復了它們的組織。在雅加達，過去曾有一些學習小組時常湊在一起——它們在非法的黑暗中工作——後來它們漸漸成為致力於偉大的印度尼西亞自由事業的戰鬥者的組織。

在日本法西斯佔領期間，雅加達的人民與日本人之間經常發生衝突。不僅在雅加達是這樣，在爪哇各處都是這樣。在打橫、南安山——西爪哇富饒的產米區——農民發生

暴動，拒絕把大米交給日軍。到處都動了起來——那種緊張的局勢可以感覺得到。在雅加達衝突發生了。在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印度尼西亞的大學生舉行了示威，反對日本人所鼓勵的對待老學生的辦法。這對於那時已搖搖欲墜的日本政權來說已受不了啦。學生們遭到了襲擊，雅加達的街道成了激烈衝突的場所。“日本憲兵隊”——日本的秘密警察——出動了，鎮壓了反抗，雅加達的街上染遍了鮮血。……

這是在雅加達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同時，印度尼西亞好幾個地方的人民也動起來了。

雅加達是發生過歷史性事件的城市：它看到了一個英勇的革命的開端，這個革命的跡象在街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

在雅加達一天的印象是使人應接不暇的。街頭的景象生動而且繁多，每一分鐘都帶來了驚奇。路旁擺着吃食攤，在那裏可以買到炒飯和最好的英國香烟。人們對香烟不感興趣，但對炒飯、食品或椰子糖却很感興趣。在房子的前面，老的和年輕的印度尼西亞人都蹲在地上，手裏捧着一張香蕉葉，裏面盛着米飯，有時拌有少許的魚或肉。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天中唯一的一餐。

雅加達的交通很混亂，比在阿姆斯特丹要混亂得多了。在路口，一長串的汽車等待交通警察放行的手勢。令人懷疑的是這一長串無窮無盡的汽車怎樣能夠開過狹窄的街道。這裏幾乎沒有林蔭大道，只有狹窄的小街。有時最新式的寬敞的美國汽車——在雅加達還不少——飛馳而過，經常發生事故。

在整幅交通混亂的圖畫中，三輪車是非常奪目的，它們

像水流中聚集着的成千成萬的螞蟻，在整個圖畫中佔着主要地位。它們是三個輪子的腳踏車，駕駛人坐在後面的車座上，乘客坐在前面的一個油漆的小車廂裏，車廂的兩邊插着羽毛簾，作為裝飾。它是一種帶輪子的不舒服的扶手椅——一種精製的運行李的腳踏車。這些三輪車在印度尼西亞各城市都有。一個三輪車夫告訴我們，他們在全國的人數約有十萬人。車夫的生活很苦，這不是一種可以長久維持體力的工作。三輪車夫成天在街上兜攬顧客，沒有間歇的時間。他們歡迎所有能夠找到的貨物。車夫常常是些瘦小的孩子，他們一次得載運三個乘客。或者是好幾袋麵粉、皮箱或傢具。在這種悶熱的天氣裏一天的辛苦勞動所得，也許只够繳付車租。……他們中間有許多入無家可歸，終日不得一飽，他們屬於露宿街頭的一羣，屬於人數愈來愈多的生活在極端痛苦與貧困中的一羣。

我們的印度尼西亞嚮導告訴我們詳細的情況。他們帶我們參觀雅加達的實況。我們沿着雅加達的許多運河中的一條運河走着；這條運河是讓·比埃特松·康恩的一時高興而開鑿出來的。這些微髒混濁的“河”已經成了公共的浴池了。居住在雅加達的成千成萬的印度尼西亞人家裏沒有自來水設備。按說他們可以出高價去一桶一桶地零買。但是他們賺錢不多，不能奢侈地購買足夠的這種昂貴的液體。唯一的出路是河——污濁的運河。

成千成百的人在這褐色的河水裏洗澡。男人、女人、小孩、才滿三個月的嬰孩和花白鬍子的老頭兒、大男孩和大女孩——他們都得在河裏洗澡。什麼事都得在河裏做：洗臉、刷牙、涮衣服、大小便。夜晚是最熱鬧的時候。人們爭先恐後地跳到河裏去。他們想要涼快涼快，而河裏是唯一可能辦得

到的地方。

“這些人不懂得什麼是衛生。”我們聽到一個富有的荷蘭種植園老闆用肯定的口吻這樣說。他自己也許有兩個自用的浴室，有一個比一些印度尼西亞家庭住的小房間還大的盥洗室。想一想——這會不衛生麼！但是在連一個自來水龍頭都沒有的時候，要遵守衛生規則是很困難的。這也許是太複雜了，不是一個種植園老闆所能了解到的。也許這是太微妙了……

要把雅加達——或者整個印度尼西亞——寫得令人相信，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要證明“難以置信”的事情是真實的，這不是容易的。

你必須親眼看到它，你必須親自和那裏的人談話。讀者也許會這樣責難地說：是的，但是這一切都是黑與白，都是極端！

這是對的。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是黑與白，是極端。無限的貧困和無限的財富，這就是所有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典型圖畫。

我們可以把雅加達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當地人民住的破陋不堪的村莊，那裏都是用竹子搭成的小屋，在另一部分住着外國資本家、高級官員和外國托拉斯的高級職員，嶄新的住宅區裏房子都像宮殿一樣。

我們走遍了城市的內區，經過著名的新市場，這是一條熱鬧的市街，中國人和阿拉伯人兜售一切可以供應的東西，現在我們來到了文登，現代化的新區。

在赤道國家，黃昏是很短的。二十分鐘以前天還是亮的，可是現在幾乎是全黑了。文登的宮殿似的大別墅的窗子裏已經有了燈光，各個別墅之間隔有相當距離，別墅的周圍

有着整齊的草地和樹木。我們想看一看釘在花園石壁上的大木牌上寫的名字，我們的嚮導用手電筒照着。伏肯尼埃、普林生、克里恩、麥考埃……。這些都是荷蘭人與其他外國人的名字，偶而在他們中間，也有印度尼西亞人的名字，高級政府官員的名字。這是金錢的外國人的領域。

“他們有着高樓大廈……”我們的嚮導用沉痛的聲調說。“成千成萬的印度尼西亞人無家可歸，什麼財產也沒有。我們的人民就是這樣不了解，我們是沒有自由的。新的市區峇油蘭正在建設中，它將比文登還要豪華。自然這不是給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建設的，也不是給印度尼西亞人建設的，而主要是給外國人建設的。”

在馬路拐角上有一家大電影院。正在上映一張美國影片，影片的名字被裝成霓虹燈，光芒四射。在文登，有最新式的電影院，它們是為外國資本家或外國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服務的。我們的嚮導提到了沙里爾和哈達的名字。他們榨取巨額的利潤。到處可以看到大飯店，都極盡奢侈豪華之能事。它們不像在其他地區的到處可見的小巧的印度尼西亞或中國咖啡館。在那些咖啡館裏，你倒可以吃到一頓實惠的“肉麵”、“米飯”或炒田雞。而那些大飯店，只是紙醉金迷的夜總會。

我們並沒有久留，我們不喜歡這些東西。溫度下降了一些，我們可以忍受了。一羣散步回旅館是很舒服的。

在人行道和門廊上有人在睡覺。其中有一個婦女，懷裏抱着一個只有幾個月的嬰孩。這些都是雅加達的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的人。

雅加達的人口據估計約250萬。人口每天都有增加，因為時常有農民帶着他們的家眷離開農村到城市裏來。由於

回教國運動和其他反動匪幫集團所造成的恐怖，成千成百的農民被趕進了城市。他們設法在城市裏謀生。他們在橋下、門廊上、電車站上和公園裏睡着住着。沒有房子供給他們，也沒有建築新的房屋。殖民制度對人民的疾苦是充耳不聞、熟視無睹的。

“過去這裏有范赫茲的塑像。”我們的嚮導指着一片草地的中間對我們說。亞齊的壓迫者的像，荷蘭壓迫的象徵，已經被摧毀了。人民不再愛它了。但是就在范赫茲像從台基上倒下的地方，有好幾十個人躺在那裏睡覺，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安身。

現在却有一個活生生的象徵，它證明：雖然范赫茲像已經從他的台基上倒了下去，但殖民主義却還沒有消亡。

我們回到旅館以後，就沒有馬上睡覺。我們的印度尼西亞朋友對我們照顧得十分週到；他不知從那裏弄到了幾瓶檸檬汽水，我們就坐在廳裏喝了起來。雅加達的第一天給人的新印象是很多的，因此，就不容易入睡。但這只不過是開始。一段漫長的旅途和許多工作在等待着我們。

一個小孩子跑來，問了我們的朋友一些話，但是他搖了搖頭。這孩子是個賣吃的。他是在兜售飯菜。他什麼菜都能做：童子雞、烤牛肉、肉麵、炒飯、或是炒鴨蛋，孩子的年紀大約是在十歲左右。他從一個客人那裏走到別的客人那裏，客人們都還坐在廳上。他和他七歲的助手一起，在院子裏做起菜來。他們做菜像閃電似地快，而且非常熟練。他們推着裝有一隻草筐的車子走了，草筐裏盛着食物和一些罐子、鍋子和一隻非常原始的爐子，可是別的賣吃的還不斷地到來。他們都是孩子，晚上在街上兜來兜去，爲了賺一些錢。老遠就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叫賣聲是唯一打破夜的沉寂

的聲音。“賣吃的啊！”就像悲愴的歌聲。

我們上牀好久以後，還可以聽到這些孩子的聲音，總是重覆着同一句話，在找尋一個深夜的顧客。

三 橫越爪哇島

看起來好像是戰爭的景象。

月台上到處站着全套武裝的兵士。隸屬於印度尼西亞陸軍的穿著綠色軍裝的一羣羣的軍人手裏拿着輕機槍沿着列車踱來踱去。

火車裏面已經擠滿了人。那些能夠佔到座位的已算是幸運的了。其餘的乘客不得不在座位間的過道上或在車後的望台上弄到一席之地。這是一羣形形色式的人。有年老的像貴族般的日本人，穿着乾淨而漂亮的衣服，遠遠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從日惹來的；也有沒有帶行李而只帶着一籃水菓的純樸農民——有一個農民甚至在車後的望台上看守着裝在籠子裏的在咯咯地叫着的雞。還有帶孩子的婦女。

我們在露天站了一會。早上六點鐘是一天最好的時光。在雅加達的甘密埔車站同行的朋友們開始和我們握手告別。雅加達—泗水快車就要開車了。兵士們進入最後一節和最前一節車廂。一隊兵士把機槍架在火車頭上。

我們的一位朋友指着車廂頂說：“在車頂上還有一些人。以防回教國運動太不講理的情形。”

在幾天以前，報紙上曾經登載了一段關於一羣全套武裝的匪徒襲擊開往萬隆的一列火車的消息。有幾個旅客被殺害了，有一些受了傷。很多人遭搶劫。西爪哇已成為危險

地區。人們一離開市鎮，生命便有危險，特別是在日落以後。這是爲什麼當我們提議要到西瓜哇的鄉村去看看時，爲我們担心的工會朋友們總是搖搖頭。

幾年以來，印度尼西亞風景最美麗之一的西瓜哇已成爲幾個武裝集團出沒之所。這些集團大都不是保護居民，而是恐嚇農民，焚燬農舍，劫掠村莊。風景秀麗的普里安格爾受到四面八方來的威脅。

我們面對面坐在悶熱的車廂內小房間裏。火車在雅加達附近的鄉間行駛着。我們那位矮小的嚮導馬都拉人告訴我們說：“在這裏活動的主要是回教國運動。”回教國運動是一個狂熱的反動集團，它僞稱要建立一個回教國家。它和封建地主的政黨——瑪斯友美黨有密切關係，而這些地主多數是和荷蘭帝國主義相勾結，並利用回教作爲它們活動的烟幕。瑪斯友美黨是印度尼西亞最重要的政治集團之一，它曾經幫助履行倫維爾協定，對荷蘭殖民主義者屈服和進攻自由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這個政黨也是在茉莉芬挑釁事件以後爆發的恐怖活動的一個推動力，這種恐怖活動的目的是在摧毀年青共和國的有組織的力量。

“但是回教國運動和這些襲擊居民的其他匪幫的後台是什麼呢？”我們想更正確地了解一些。

他於是提到前荷蘭殖民軍的軍官鮑斯上尉和史密特的名字。我們在印度尼西亞聽到這些名字已經好多次了。他們是爲印度尼西亞全體人民所憎恨的“兇惡的暴徒”威斯特靈^①的幫兇。有許多從恐怖活動極爲猖獗的地區來的印度尼西亞人曾經告訴我們：這些匪幫實際上是由前皇家荷印軍的軍官所領導的，而荷蘭的資本家和官吏則在背後牽綫。這些爲匪徒們打氣的人竭力設法隱在背後不露面。但是有

幾個企業的經理人是和那些支持外國企業有權支配當地居民的武裝集團有密切關係的，這件事已漸漸地成爲公開的秘密了。這是使這種企業獲得各種特權的一個重要手段。很久以來，資本家依靠封建地主和腐敗官僚來奪取當地居民的土地，並以極低的租金強迫農民把他們的土地交給公司使用。現在他們又在利用武裝匪徒了。回教國運動以及其他盜竊與綁票匪幫的罪惡活動是外國帝國主義者所控制的一種工具。這種恐怖活動的目的是在恐嚇和鎮壓在那裏有龐大外國企業的西瓜哇的農民。

西瓜哇是種植園的一個重要地區。許多荷蘭的企業以及英國的企業都是該地該土地的所有者。它們的企業遍佈西瓜哇全省並佔有最好的土地。這種情形引起了那些自己缺乏土地，因而無法謀生的農民的憤怒和反抗。

他們所憎恨的特別是外國企業。外國企業的存在時時刻刻表示，外國利益處處優先，人民的生活受它的支配。

在這種情況下，蘊藏着再度發動偉大的農民反抗運動的根源，這種運動是在反對外國資本家以及印度尼西亞社會中那些支持這些資本家並且是他們的權力基礎的分子。大家可以看出這種深刻的矛盾，必然會使農民革命運動再度高漲起來。

爲了壓制這種危險、防止印度尼西亞農民的覺醒、並阻止更多的農民羣衆組織起來，外國帝國主義者便使用了恐怖手段。武裝匪徒的活動就是企圖恐嚇農民，使他們不去參

① 威斯特靈是荷蘭殖民軍的軍官，1948年間，煽動並率領土著軍縱橫行爪哇和附近各島嶼，殺人放火，危害居民。印度尼西亞政府派兵鎮壓，威斯特靈無法立足，最後在荷蘭殖民當局的幫助下，乘荷蘭軍用飛機逃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政府曾要求新加坡英國當局引渡及辦，但無結果。後來由新加坡當局將威斯特靈交由荷蘭領事送回荷蘭釋放。——譯者

加鬥爭。從事反抗的農民可以由武裝匪徒來勒令他們“安分守己”。

但是這些恐怖集團的作用也有另外的一方面。他們所造成的混亂情形常常可以作為外國——特別是荷蘭——進行干涉的口實。它們可以這樣說：印度尼西亞人無法收拾這個局面，我們必須來幫忙！而這種推理還可以更進一步，例如：如果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連爪哇的秩序都不能維持，那我們怎能信任它能在西伊里安維持秩序呢？因此，這種局勢對荷蘭帝國主義者來說，是有許多好處的。

這就是為什麼對回教國運動和其他匪幫沒有真正進行作戰的原因。雖然間或和印度尼西亞陸軍發生一些衝突，但是沒有對它們採取真正的行動。

在上述以外，唯一有效地結束這種有組織的紊亂狀態的辦法是把農民武裝起來。使他們能夠保衛自己，保衛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並且能夠幫助消滅那些反動匪幫。

但是這是雅加達所不願意做的事，而且一直拒絕這樣做。

在印度尼西亞現在還有很多武裝活動，但是把這些活動同樣看待也將是錯誤的。它們並不全是恐怖分子集團。在爪哇有些地方和印度尼西亞的其他地方，像西里伯斯島（即蘇拉威西——譯者），有居住在山中或森林裏的獨立的武裝集團。其中有許多是由曾和日本人作過戰的人組成的。這些人在兩次殖民戰爭期間曾進行抵抗，並認為他們的鬥爭還沒有結束。在貫徹皇家荷蘭區的軍官的領導權時從印度尼西亞陸軍中故意被排擠出來的一些戰士不滿意情勢的發展，並且知道他們的國家還沒有解放。在他們的革命達到最後目的並在全印度尼西亞獲得真正的勝利以前，他們不想

放下他們的武器。但是他們的活動和回教國運動的活動有很大的不同。印度尼西亞農民曾告訴我們說，這些軍隊並不搶劫他們，有時還幫助他們。還可注意的是，從還有武裝活動的爪哇的其他地區以及西里伯斯島，沒有傳出過關於劫掠當地居民、殺害農民領袖或工會領袖的消息。如果沒有居民的支持，人們懷疑，這種集團是否能夠存在下去；它們所受到的鎮壓比回教國運動所受到的更來得嚴厲。但是印度尼西亞人民是十分痛恨恐怖分子集團的。

我們的旅行一路無事。兵士可以安然小睡。火車在富饒的熱帶景色中飛馳着。我們靠窗坐着，生怕漏看了一件事物。火車經過外貌簡陋貧窮的小鄉村，一幅美麗如畫的風景：棕黃色的竹屋和碧綠的樹葉相映成輝。成羣的竹屋好像燒焦了的斑點，點綴在天然的綠叢之中，成了鮮明的對照。一個小孩把兩條水牛趕到沿着村莊流過的小河裏。這兩個動物安靜地站在水裏，頭、頸、和寬闊的灰色背脊露出水面。一會兒，那個活潑的、光着身子的小孩跳到一條牛的身邊，坐在它的強壯的背上。他頭上只戴着一頂寬大的草帽。他似乎自得其樂。他向火車揮動他的棕色小手臂。這是一幅太平的景色。只有火車上的警衛才說我們是在一個最危險的地區。

火車的速度開始減低下來。這裏正在修鐵道，所以我們前進極慢。在火車的一旁，小孩們似乎想跟火車慢步前進。他們在叫喊，舉起了一頂帽子或是一片紙。看起來他們好像是七八歲的小孩。有些旅客偶而從窗口丟出一枝香煙或一隻香蕉。一切東西都被靈巧地攔住了。小孩們行動極為敏捷。有兩個小孩撲在地：他們正在爭奪戰利品——一片從餐車裏丟出去的麵包。勝利者舉起那片麵包，快活地跳躍，

發出勝利的笑聲。這種景象隨處可見。遇到火車放慢速度或是停留一會的時候，我們都看到同樣的情況。有些頭等車的旅客認為這種變換很有趣。

印度尼西亞的風景實在動人。我們慣居在荷蘭平坦的土地上，對這種巍峨叢山和俯瞰着全景的火山的雄偉景色有深刻的印象。氣候正在轉變——雨季即將來臨。在那蔚藍的天空裏，凝聚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烏雲。我們抬頭一望，就想起了我們荷蘭多雲的天空。

西爪哇這個地區好像是一個大植物園。一長列一長列魁偉的棕樹和常綠的叢林形成了風景畫的背景。這像是一首交響曲的主題，在重複地演奏着。沿着鐵路，我們看到一處橡膠種植園，有幾公里長。成千棵橡膠樹排列成整齊的行列，像整列的兵士那樣，彼此之間的距離相等。樹幹上掛着接橡漿的小碗。在山坡上，有許多茶園、橡膠園和煙草種植園，在山谷裏却生長着甘蔗和稻。

我們忽然看到左邊開闢的稻田，一大片的水田。農民們和他們的水牛很吃力地澆水通溝。他們整天在熱帶灼熱的太陽下工作。大多數農民戴着尖頂圓邊草帽。許多稻田裏的稻禾是受到保護的。在稻禾上面扯着綫，綫上繫着一片片的布或紙。小孩們坐在竹子搭成的小閣中，保護稻田，以防飛鳥來襲。鳥一出現，他們就拉那些綫，白色的布片或紙片就上下擺動。

這裏周圍的氣氛是安靜的；人們都感覺到印度尼西亞無可估量的富饒。什麼東西都生長。這裏，在地面上或地底下，可以找到人們需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之一。但是，當我們進入老百姓居住的村莊或鄉村時，我們都為他們的貧困所感動。在地球上最富饒的一個國家裏

住着一個最貧窮的民族。這是殖民主義的反常的對照。這種對照支配着這裏的一切政治生活。

看到了這種大自然所顯示的極端富饒，我們想起了在學校裏常學到的一些數字。

印度尼西亞是世界市場的最重要的供應者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世界總產量中，印度尼西亞所佔的百分比^①是：棕櫚油佔24%，椰乾31.2%，橡膠34%，錫18.5%，茶葉17%，奎寧90%。此外，印度尼西亞還出產世界石油供給量4%。但是並不止此，還有金、銀、金剛鑽；甚至傳說在西伊里安還有鈾。

所以印度尼西亞是許多重要原料和熱帶物產為人垂涎的來源。

不用說，荷蘭帝國主義者和其他外國帝國主義者將竭盡全力使這塊重要的土地掌握在他們手裏，不論他們用什麼方法和偽裝來掩飾殖民主義的事實。外國托拉斯對於這一點是心心相印的；印度尼西亞幅員廣大，地位重要。全部羣島的面積有190萬平方公里，即比荷蘭大55倍。印度尼西亞共有2,000個大小島嶼，它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島嶼集合體。同時，它在東南亞佔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上次大戰爆發時，日本人立刻把矛頭指向印度尼西亞，這不是沒有緣故的。首先是由於印度尼西亞的石油和其他原料，而且他們也想以印度尼西亞爲軍事基地來控制印度洋和中國的南海，以便能更好地掌握在大陸上所征服的土地。

^① 根據“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中所附艾地的“走向新印度尼西亞”一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印度尼西亞在世界總產量中所佔的百分比如下：棕櫚油佔25%，椰乾佔31%，橡膠佔40%，錫佔18%，茶葉佔19%，奎寧佔91%，石油佔10%。——譯者

印度尼西亞形成了澳大利亞和東南亞大陸間的一個重要橋梁。在東南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已完全展開。喪失擁有八千萬居民的印度尼西亞對於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勢力將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在那種情形下，想再度努力建築堤壩來防止在越南以及印度、泰國和馬來亞大為發展的民族解放運動，在事實上便是不可能了。

難怪荷蘭帝國主義者和其他外國帝國主義者這樣注意印度尼西亞；對他們說來，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打倒荷蘭帝國主義！取消圓桌會議協定！”當火車進入井里汶車站的時候，高舉的旗幟上寫着這樣的話。在紅旗和紅白色的國旗的中間，我們又看到寫着“荷蘭工會聯合會萬歲！荷印兩國人民團結萬歲！”的標語。好幾千人正在等待我們。大家都擁過來想儘量地靠近火車。有節奏的鼓掌聲、呼喊聲震徹車站的棕色屋頂。

一個印度尼西亞年輕人——當地工會的一個委員——走上前來。他發表了一篇演說，談到印度尼西亞人民在荷蘭帝國主義統治下所遭受的苦難，談到荷蘭的工人；他知道荷蘭的工人是他們最好的朋友。他的話受到喝采。大家唱起國際歌，可以看出每一個人都受到了感動。這些旗幟上所寫的和這位年輕的工會委員所說的是正確的；荷蘭帝國主義仍舊統治着印度尼西亞。

幾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移交政權”儀式，教堂的鐘聲響了，大鐘也伴奏起了音樂。這種鐘聲傳到了印度尼西亞，而在雅加達獨立廣場的一個大會上也發出了共鳴。在荷蘭，也在印度尼西亞，許多人都被這種情況所迷惑。……終於成了事實嗎？人們心裏想：荷蘭帝國主義已經放棄了它在這個羣島上的地位。

以後的幾年使我們逐漸明白些。教堂的鐘聲和獨立廣場的大會都不能把情形改變過來。在印度尼西亞，人們已經感覺到真實的情況。印度尼西亞廣大的人民已從他們自己的經歷中認識到：自由還沒有實現，“獨立”或“自由”的口號仍舊是鬥爭的目標。

在雅加達的最初幾天已給了我們以深刻的印象。荷蘭資本家仍舊在印度尼西亞佔着重要的地位，仍舊隨心所欲地左右着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生活。他們在公共機關中佔有最有權力的位置，而把“Kementeriaan”（係印度尼西亞文的部——譯者）的牌子來代替“Menisterie”（係荷蘭文的部——譯者）並不保證荷蘭帝國主義勢力在國家機關中消失。

恰恰相反，在對荷蘭帝國主義者有很大利害關係的經濟部和農業部的重要職位上，還有荷蘭的高級官員，有時稱為“顧問”，而實際上却是首長。許多荷蘭公務員已被遣返回國，但大都是下級人員，如辦事員、低級的行政人員之類。低級的荷蘭公務員是沒有了，但是高級的仍留了下來。所以在印度尼西亞還有兩千名荷蘭公務員的時候，我們可以肯定這些人大部分是舊日荷蘭機關中的領導人物。他們受到荷蘭資本家的完全信任，能夠左右政府的政策和政府決議的執行的。

我們記得有一次曾到爪哇銀行去兌取一張旅行支票。印度尼西亞籍職員坐在辦公室窗口後面。他們收款、登記、做行政上的工作。我們為好奇心所驅使，對所有各部門瞧了一下，各處都是一樣。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不止於此。每個房間或大廳的盡頭所擺着的首長的辦公桌後面都坐着一個荷蘭籍職員。一個辦事員私下告訴我們說：“這種人很多。”他

聰明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說：“經理有許多荷蘭籍助手。”

實際上這是一個大家知道的事實，爪哇銀行——所謂印度尼西亞的國家銀行——的經理是被一羣與荷蘭金融與商業集團有密切關係的顧問和首腦包圍着的。

這裏的氣候雖然和荷蘭的氣候極不相同，國家和人民看上去也絕不相同，而我們却時常以為是在荷蘭。

譬如在丹絨不錄的港口，一切事物都使我們想起荷蘭。在那高大的石牆上，在那長長的倉庫上，在攤販的貨櫃上用龐大的、傲慢的字體漆上了鹿特丹·勞埃德公司、荷蘭船公司、荷蘭輪船公司、荷蘭郵船公司等等的名字。一切通告由擴音器用荷蘭語播出。整個港口的管理工作都操在荷蘭航運公司的手裏。這個港口是一個四周完全由憲兵守衛着的小國家，非持有必需的證件都不能入內。我們也受到嚴密的搜查，在證明一切都沒有問題時，才被准許通過。

在一切大港口，以及泗水和較小的港口三寶壠都是這樣。港口都為荷蘭航運公司所壟斷，這些公司握有通達印度尼西亞的最繁忙的航綫，並完全控制着島與島間的全部交通。海洋是可以自由航行的，但是在碼頭停靠必須得到荷蘭航運公司的許可，它們把印度尼西亞所有的碼頭和重要的港口設備都租了下來。在泗水的海運局裏，荷蘭籍的海事人員和公務員指揮着一切。

所以我們說印度尼西亞的港口和海運事業是屬於荷蘭帝國主義者的，這是很對的。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很有力的武器。它是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權力系統有關的一個重要部門。像印度尼西亞那樣的島國是依靠着它的港口的。港口和航運事業不由它自由支配，即無真正獨立的可能。

荷蘭帝國主義不但控制着印度尼西亞國家的權力機關和軍事與經濟上的交通樞紐，而且還控制了全部的經濟生活。荷蘭帝國主義藉着圓桌會議協定恢復了它在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地位。

在我們旅行西爪哇期間，我們立刻感到了這一點。在一切重要地區，人們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以覺察到荷蘭企業的活動。各種熱帶農產品仍掌握在荷蘭種植公司手裏；這些公司把印度尼西亞人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了，然後開墾了這些土地。報紙上的新聞也提供了同樣的消息。

荷蘭“自由人民報”寫道：

“1951年這一年是在印度尼西亞的西方工業最賺錢的一年……儘管有關於地方不安全、偷莊稼、殺人事件和運輸上困難種種令人沮喪的消息，而荷蘭工業界在1951年寄回荷蘭的利潤還比1929年經濟繁榮以來所能寄回的利潤來得多。”

這是意味深長的；因為1929年是荷蘭殖民地企業情況最好的一年。這是在殖民地利潤的歷史上燦爛的一頁。許多聰明的殖民地專家在提到那一年時還是不勝追念的。

范凡孚—赫勃萊希特公司是一家銀行和代辦商。它很知道這方面的一些情況。在它的一個金融報告中曾寫道：

“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種植企業，特別是橡膠公司中還擁有的龐大利益是我們公司決定再行刊發交易所和種植界中稱為極好的‘范山特斯小冊子’的原因。”

我們不知道那個著名的“范山特斯小冊子”是本什麼樣的小冊子，因為我們沒有常到交易所去的習慣。但是可以看出，交易所中的荷蘭資本家和投機商人仍然藉助於范山特斯和他的小冊子而對印度尼西亞人民進行剝削，而這種剝

削對於這班資本家和投機商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旅行印度尼西亞之後，我們對於這一點是沒有什麼懷疑的了！搶走印度尼西亞生產品的荷蘭種植公司，像愛夫羅公司、日里種植人協會、咖啡園、茶園、橡膠園等等都正在把它們的觸角伸展到全印度尼西亞和住在那裏的人民。

頑固分子正在繼續進行他們的活動。儘管有高貴的莫爾塔杜力的願望，他們還是沒有在他們的咖啡中被宰死。……要實現這一點，還需要加一把勁。

它們的財產是受到權力機關的保護的。在這一方面內行的范凡孚—赫勃萊希特公司得意洋洋地告訴我們：“蘇門答臘東海岸的情況良好。警察越來越擴充了。警察的組織一直在改進中。”交易所大亨們還告訴我們，商業界對印度尼西亞最後的將來更有信心。他們的意思是說，對他們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利潤更有信心。

我們在雅加達曾經和一位印度尼西亞的政治人物——一個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談過一次話。我們談到外國企業的活動，以及外國帝國主義者對印度尼西亞的事務的干涉。這位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說：“我們還沒有獨立。”一會兒，他又接着說：“殖民地政治的時期是過去了。殖民地經濟的時期仍在繼續之中。”他的第一句話是有問題的。要把政治的殖民主義和經濟的殖民主義分別開來是絕對不可能的。兩者是像身體連在一起的暹羅雙生子那樣分不開的。

但是第二句話證實了我們每天在印度尼西亞所看到的情形；印度尼西亞仍舊是一個殖民地國家。外國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那樣的干涉是直接違反印度尼西亞人民和他們經濟發展的利益的。當我們總工會的朋友說到外國資本家像

繞着蜜糖罐飛的蒼蠅時，這位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點了點頭，表示同意。“這是你形容這種情形的方法，是不是？”他對這句話笑起來，他初次聽到這種話。由於這種帝國主義者的干涉和外國資本家所享有的殖民地特權，人民生活水平極低，外國種植園工人和港口的工人受到中古式的剝削。特別在日本投降後興起的印度尼西亞民族小工業受到摧殘。充斥印度尼西亞市場並排斥其他一切的外國紡織品已對幼稚的印度尼西亞紡織工業造成了危急的局面。被強有力的外國競爭所打倒的小玻璃工廠也是如此。大部分在東爪哇的製造炒菜鍋和其他家庭用具的金屬小工業受到了爪哇鋼鐵托拉斯的控制；這個托拉斯緊緊地、無情地支配着一切。

我們的談話因為燃點一枝紙煙而停了一下。這不是土麥克牌或是老麥克牌紙煙，而是一枝印度尼西亞的紙煙。這是厚而粗的手工製造的“克雷特”牌紙煙。在吸這種煙時可以聽到輕微的爆裂聲。人們稍加推想便可以聽出“克雷特—克雷特”的聲音，這種牌子就是由此而得到名字的。我們的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朋友叫這種煙為“克雷克—克辣克”。我們吸了幾秒鐘煙，整個屋子的氣味就像一個製糕餅的工廠，因為紙煙裏含有了香料。人們習慣了以後就覺得很舒服——它使人們的喉管有溫暖的感覺。

這種紙煙說明了全部問題。

克雷特牌紙煙工業就是這些幾乎被外國企業擠垮的民族工業之一。在印度尼西亞設立的並且把它們的產品投入印度尼西亞市場的外國紙煙工廠——印度尼西亞的企業大受打擊，以致在外國工廠的壓迫下搖搖欲墜——正在進行激烈的競爭，並且利用它們所有的力量使政府實行儘可能不利於印度尼西亞幼稚的紙煙工業的各種經濟性的規定和

法律性的限制。克雷特工廠所必需的丁香的貿易也同樣遭到種種麻煩。

這是外國公司和印度尼西亞民族利益間發生衝突的實例之一。

這種矛盾在各種不同的問題上一再出現。它支配着一切政治問題和每一次的政治危機。

我們問：“你對於蘇門答臘所發生的事情看法如何？農民被資本家趕走了。在機動部隊的幫助下，農民被驅逐出去，他們的房屋被壓路機壓得粉碎，而他們一直耕種着的田園被破壞和犁掉。經過外國種植園老闆的活動和他們軍事保護行動以後，印度尼西亞的農民可以引這句老話：‘指給我看我曾經播種過的地方。’他們的生計被剝奪了：土地被奪去，他們不能耕種了。你認為政府對於這一方面應該做一些事並幫助農民嗎？”

那位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考慮了一下，吸了一口他的冒着煙的煙捲，吞吞吐吐地說：“是的，政府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你們知道，關於這一件事有很多的困難，並且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或者會發生政治危機。現在很難答覆你的問題。”

那位印度尼西亞國民黨人笑了，一副外交家的笑容。顯然現在我們不能希望有更多的答覆。

但是在蘇門答臘這種農民和外國資本家間的尖銳對照引起了土地問題、對農民的剝削問題。

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像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一樣，印度尼西亞主要是一個農業國家。在目前，農業是它的經濟的基礎。

而在這方面，荷蘭資本家有極大的勢力。他們大多數

從事剝削農民的種植業。這就是說，絕大多數的印度尼西亞人——印度尼西亞人中 80% 是農民——是直接地和間接地反對荷蘭帝國主義和它的利益的。不把這些農民解放出來，不把控制土地的荷蘭帝國主義摧毀，印度尼西亞人民是絕對沒有獲得自由的可能性的。

這些種植園遍佈全印度尼西亞，在蘇門答臘和爪哇特別多。我們到處看得到這種種植園。對印度尼西亞的農民來說，這些種植園是他們眼中的一根刺。

1938 年，有 2,937,767 公頃已開墾的土地掌握在外國企業的手裏（包括農業租讓地、世襲領地、所謂居民自由出租地在內）。

這個面積是很大的。這說明印度尼西亞的情況和其他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內的情況的不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外國企業並不直接擁有土地，或是至少很少擁有土地的，他們是利用當地的封建統治者來從事對農民的剝削。然而印度尼西亞也有這種方式。因為即使在外國企業手中的土地的總面積是很大然而它在印度尼西亞已開墾的土地中仍然只佔一小部分。

在爪哇總數達 800 萬公頃的土地中，約有 100 萬公頃是外國企業的財產，但是在其餘的 700 萬公頃土地上，許多生長出來的農作物都是供輸出之用的，通過鄉村中為數很多的當地封建地主、投機商人和中間商人而輸送到外國資本家手裏。因此，當地的封建統治者和外國帝國主義者是密切勾結的。他們互相支援。外國資本家在追逐儘可能大的經濟上的利益以及力圖鎮壓千百萬印度尼西亞農民的時候，它們是依靠印度尼西亞農村社會中的反動的封建分子，依靠封建剝削制度。荷蘭的權力是以印度尼西亞社會的封建

的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這種制度允許無限制的掠奪人民和嚴厲鎮壓農民。因此，想使印度尼西亞社會解脫封建主義的桎梏，並為印度尼西亞社會的發展掃清道路的各種力量正在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發生衝突。

在印度尼西亞，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首先是在農業地區仍舊起最重要作用的荷蘭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起發生的。如果不摧毀荷蘭帝國主義，則80%的印度尼西亞人民——農民羣衆——的自由是無法實現的。農民的自由，印度尼西亞人民這個龐大集團的積極鬥爭，是實現印度尼西亞的真正獨立、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解放和把一切外國帝國主義者——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等——完全驅逐出去的決定性因素。

儘管帝國主義者之間確有許多矛盾存在，荷蘭帝國主義在許多方面充任了在印度尼西亞擁有勢力的其他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或看家狗。這不是一件很新的事，在荷蘭殖民主義者於戰前不得不遵行的門戶開放政策期間，它早已這樣了。

在國家機器中和印度尼西亞軍事鎮壓制度中的荷蘭人保護之下，其他外國帝國主義者正在擴張它們的勢力。而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使干涉印度尼西亞的內政問題在法律上成為可能。

關於這一方面的明顯實例是西伊里安問題。印度尼西亞人民很正當地要求西伊里安應由荷蘭移交給印度尼西亞。

那些曾經燒殺印度尼西亞人民、焚毀村莊和鄉村、曾經用希特勒式的濫炸殺害印度尼西亞婦孺的人們，現在對於這個巴布亞(伊里安的別名——譯者)嬰兒的命運忽然擔心

起來。

那些從來沒有想到要把適當的教育傳給印度尼西亞的人們，現在却成了主張爲巴布亞人開設學校的狂熱宣傳家。而這種學校只能由荷蘭人來設立。

他們到處搜索着“論據”，藉以證明西伊里安仍歸荷蘭佔有乃是合乎巴布亞人的利益的。

比巴布亞嬰兒的命運和設立良好學校的熱情更重要的也許就是大家都在說的，就是在西伊里安可以找到鈾，而且在那裏還藏有鐵礬土和石油。

荷蘭殖民主義者對這樣的小事情並不操心。雅加達流傳着謠言說，荷蘭政府已經把開發西伊里安地下富源的權利租讓給美國公司了。

這說明了爲什麼美國人贊成荷蘭佔領這塊重要的地方。但是還不止於此。從前，帝始島是曾經拘禁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的集中營和銷壓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衆所畏懼的地方，現在他們企圖在那裏建築一個防禦印度尼西亞人民解放運動的堤壩。

在西伊里安的荷蘭基地，在那裏經常準備從事作戰的荷蘭軍隊，是對準着印度尼西亞解放運動的一枝手槍，並且爲一旦這個解放運動再度表現出反抗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革命行動時進行武裝干涉做好準備。荷蘭當局是保護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的工具。

無可否認，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同時還要犧牲必然擁有一些由來已久的利益的荷蘭競爭者來改善它們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情感上的考慮是沒有的，而且誰也不能苛求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倫敦維爾協定締結以後，美國人主

要是在採礦業方面擴張他們的勢力。戰略物資像石油、錫和鐵礬土大部分都落在美國人手裏。處心積慮的美國人正集中注意力於這種戰略物資。

美國政策慣常實行的方法是腐蝕國家機器並賄賂印度尼西亞官員，以獲得更多的勢力。美國人正在企圖以貸款和互助協定的手段來逐漸滲入這個重要地區。

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是認識這一點的；他們的眼睛並沒有閉着。他們的敵人相互間的衝突為他們的鬥爭提供了新的希望，並為他們進行反對印度尼西亞的傳統的和最重要的敵人——荷蘭殖民主義——的活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鬥爭中是可以用聯合力量把荷蘭殖民主義在一定時期孤立起來，而且和它進行鬥爭的。如果荷蘭帝國主義者的權力被摧毀了，他們在國家和權力機器中的勢力將被消滅，他們的財產將歸還合法的主人——印度尼西亞人民。而其他帝國主義者那時會陷入極端困難、無法立足的地位，只需要很短的時間，便可以把他們趕出去。

在文化方面也正在進行一個重要的鬥爭。美國人把美國的讀物充斥印度尼西亞的市場。他們特別注意學生。美國的“救濟團體”送來大量的宣傳品。在大學中，美國人支持着反對荷蘭文的鬥爭，而熱心贊助使用英文，以便利美國的讀物的輸入。但是荷蘭也用很大的力量進行這個文化戰爭，雖然這個戰爭的特點是完全沒有文化的。文化合作基金會派遣它的無名的文化人物到印度尼西亞去，他們想強使印度尼西亞作家和藝術家聽從命令。

一向在萊登大學研究殖民主義方法的教授們被派到印度尼西亞的大學中去講課。

在印度尼西亞很活躍的最重要的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文

化影響，同時印度尼西亞人民和其他文化發源地的隔離，一定會在思想上破壞爭取自由的鬥爭的戰鬥力。

這種情況是隨着完全鄙視有多少世紀偉大傳統的印度尼西亞文化和印度尼西亞語言的一貫表現而發生的。凡是從帝國主義國家來的東西都認爲是好的，印度尼西亞的文化寶藏是落後的！真正的民間音樂格郎章音樂已美國化了，存在主義和其他腐朽的哲學也被傳授給印度尼西亞的藝術家。

藐視印度尼西亞語文，因此也藐視了印度尼西亞人民，這一點我們從雅加達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來。

我們排好的日程的意外變動使我們有一個空閒的下午；這是值得歡迎的變動。我們拿起報紙，瞧瞧電影院的廣告。除了美國影片以及一部英國影片而外，沒有別的了。我們選擇了英國影片，一張不重要的片子，“三劍客之子”。在雅加達時髦市區文登的最大的一家電影院裏，我們看到三個劍客的兒子十分熱誠地宣誓效忠於他們的皇后，用他們的劍刺死了幾十個敵人，和左右的美女接吻，在絞刑架上一再勝利地死裏逃生。這實在是很有趣的。但是他們的一切對話都用英語，銀幕的下面有荷蘭文說明。觀眾都是印度尼西亞人，我們是在那裏唯一的荷蘭人。所以我們外國人不得不用我們前幾天所學到的幾句簡單的印度尼西亞話向我們的鄰座解釋這張影片。但是沒有做得很成功。這一切刺劍、接吻、在絞刑架上死裏逃生的情節太複雜了。

坐在我旁邊的印度尼西亞人出怨言說：“現在你們可明白了這裏誰在作主。”我們這才了解，即使看一次“三劍客之子”影片也會和政治發生關係的。所以我們並沒有白費了那個下午。

“右邊是海。”我們的工會朋友大聲叫喊說。整個小房間激動起來。火車駛近爪哇海的海岸，火車和海灘相距僅二十公尺左右。這裏的海灘很狹窄。船在靠近海灘的海上飄盪，船帆被新鮮的海風吹得全部張開了。這種景色是很迷人的。海水清澈，在有些地方像彩色畫片上的藍色一樣的蔚藍。我們很想躍入水中。在中爪哇，火車一路上都沿着海岸駛行，在風景中一直可以看到海洋。

我們到達北瑪琅時，月台上擠滿了歡呼的羣衆。婦女們手搖着鮮花。當我們走出火車的時候，她們把花環套在我們的頸子上。鐵路工人、附近來的農民和青年代表團都唱起歌來。這隻歌我們已經聽過好幾次了，這是有優美活潑調子的紅旗歌。我們也多少能哼幾句。

“武裝起來，武裝起來。”這隻歌的結尾兩句是很激昂的。每一個人都提高了嗓子唱着。

從站長室裏搬出一張桌子。幾隻強壯的手把我們抬到桌子上。現在輪到我們了。當我們把荷蘭工人們的敬意轉致給他們時，月台上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我們正在一起對我們的共同敵人——荷蘭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在這鬥爭中，我們正在加強我們永恆的友誼。”從動盪的人海中一直在發出呼喊聲。在北瑪琅車站的短短的停留成了一個歡樂的大會。旅客們從窗口探出身來注意傾聽，鼓着掌，並向我們揮手。火車已經耽誤了十分鐘的時間。照火車時刻表只能停留三分鐘，而我們在這裏已停了十三分鐘了。當我們抱着鮮花和禮物進入車廂，站長就發出開車的信號。在月台的盡頭，我們聽到了蕭斯塔科維奇的和平歌，幾百人在熱烈地合唱着。青年人跟着火車奔跑。火車的速度慢慢地加快。他們向我們的車廂小房間裏看，舉起拳頭表示最後的敬意。

在鐵路旁邊，許多鐵路員工以站長爲首排起了隊，他們向我們表示敬意。我們駛離了車站：我們知道我們在北瑪琅有幾百個朋友。

從雅加達到泗水的旅行是一次偉大的勝利；是印荷友誼的勝利。我們所聽到的和看到的一切都是印度尼西亞工人和他們年輕的工會——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力量的表現。

離開北瑪琅還沒有很遠，列車長、車務員和司機都走進了我們的車廂。他們都是車上新接班的員工。他們一個個作了自我介紹；並且說，他們是“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會員。”他們問我們需要什麼東西，是不是一切都很好。他們是極好的東道主。不久我們就談起來了。

鐵路員工們以他們是鐵路員工工會的會員而自豪。這個工會是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最大而最強有力的工會之一。這是一個在爭取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自由的鬥爭中有偉大的傳統的工會。鐵路員工中百分之八十都是這個工會的會員。像工會人員所說的，鐵路辦得“很好”。有一位活潑矮小的爪哇籍車務員告訴我們：乘務員在最大的車站上都要換班的。“但是這一次我們注意將接班的乘務員都換成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會員，我們應該照顧你們到達目的地。”

幾天來就和鐵路局的經理們討論了這個問題。他們不願意聽這個意見，而且一直加以拒絕。但是鐵路的員工堅持他們的要求：運送外賓應該是印度尼西亞總工會會員的任務。這個要求不得已被接受了。

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會員駕駛機車，配備了乘務員，把我們送到了泗水。他們不把這些事託給別人。我們在所有大小車站都停留。每一次停留就是一次羣衆大會。車上的小房

間對我們來講是太小了。每到一處，都堆起了禮物，其中有在茉莉芬挑釁事件中被殺害的印度尼西亞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哈約諾的大像片、小圍裙、水果籃、鄉村朋友們精製的食品包、精美的木刻品和鮮花，很多的鮮花。我們的小房間像施了魔術似地已變成一個花園了。令人陶醉的潔白的茉莉花的香味驅散了火車上污濁空氣。在北加浪岸、熾布、新埠頭、峇板——到處是異乎尋常的歡迎。在這裏表現了對荷蘭人民的友誼和對荷蘭帝國主義者的不屈不撓的仇視。

火車的時刻表已完全被打亂了，但是司機却不以為意。這種情形不是每天都有的。

我們的團結比時刻表更來得重要。

風景在變換着。這裏看起來比較荒野。我們飛快地馳過東爪哇。這個地區丘陵更多，土地貧瘠，而莊稼也很乾旱。

在曾發生農民大反抗事件的新埠頭，地方當局禁止在月台上發表演說，火車也只能停留幾分鐘。前來車站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都是正在掙扎求生的貧苦農民。

一個年輕的印度尼西亞人爬上火車的踏腳板。他對我們說了些話，由譯員轉譯說：“他們禁止我們攜帶紅旗，但是我們把紅旗攜帶在心裏。”太陽已經下山。從火車的望台上，我們看不清人了，我們只看見聚集了一大羣人。他們唱着“國際歌”向我們致敬。在旅途中，我們常常聽到人們這樣熱情地唱這首歌。

我們駛近泗水時，天已漸漸黑下來了，在那裏有幾千個朋友在等待着我們。我們已經過很長的旅程，有許多印象使我們永誌不忘。

我們已經認識到印度尼西亞工人和他們偉大的工會的力量。

在某一車站，我們走出火車和我們的朋友們握手。他們帶來了一位攝影師，想為我們和我們的印度尼西亞朋友照一張相，作為紀念。當我們站在月台的正中央時，站長吹起哨子。他似乎發怒了，舉起他的信號桿。

火車並沒有動。

哨子又吹了一次，站長和憲兵奔向機車去，大聲命令開車。司機叉着雙手，從司機室探出頭來，向我們微笑。他呆着不動。

一會兒，相照好了。我們告別了當地工會的人們，便再走進車廂。工會的領袖揮動他的手臂。

於是火車開始動了……

四 村 莊

在泗水有一個垃圾堆。

在這個垃圾堆和別的垃圾堆上面，建築了一些簡陋的小竹房子。有些房子已東倒西歪，像快塌的樣子。

在別處找不到地方住的人就在這裏蓋一所簡陋的小竹房子，或者在這些竹房子裏租一間破屋住。

這就是一個印度尼西亞的村莊。

“村莊”^① 這個名詞是很吸引人的。對遠方的人說來，村莊和鄉村都是很神秘的。我們在荷蘭學到的一首歌裏說，那裏有索利娜和克羅莫兩人彼此相親相愛，他們的生活就像夢一樣，每天聽捶鉢搗米的聲音來消磨時間。

但是現實却不是那樣。

① 印度尼西亞文為Kampung，音讀“堪蓬”。——譯者

我們沿着村莊的泥濘道路走去。第一陣雨剛下過，什麼都是濕的。破毀了的車輛停在小屋中間。到處可以看到舊木桶堆中長出來的野草。在左右兩邊堆着一些舊汽油桶。孩子們就在這裏玩耍。

在村莊的後面，我們看到了原始的椰子油工廠。椰子油的氣味污濁了村莊中的空氣。幾乎這裏所有的居民都是椰子油工廠的工人。工廠的垃圾和椰子油的臭味支配了他們的一生。大多數工人每天的工資是一個或兩個荷蘭盾。他們的村莊是一個所謂“破陋”村莊。“破陋”這兩個字現在在印度尼西亞很流行。

人民在革命中開始以他們自己的方法使用的一切東西都是“破陋”的；不論它們是外國資本家的土地或泗水的垃圾堆。“破陋”這個形容詞適用於所有與殖民主義法律相違背的東西。

幾年以前，椰子油工廠的工人安居在這個垃圾堆上，他們盡量剷除了垃圾，並在上面蓋了他們的房屋。他們找不到別的地方住，而且這又是塊荒地。他們並沒有挑最好的一塊，他們只是佔用了還沒有用過的土地。但是就連這個也是不准許的。

我們在一所小竹房子裏談話，牆壁是蘆蓆做成的。有幾個工人是村莊管理處的負責人，他們告訴我們村莊的歷史。村莊管理處是居民自己組成的，還沒有得到當局的認可。這時候，居民們都走到小屋的前面來了，許多人都是面無表情，而且身體瘦弱，好像營養不良的樣子。

村莊管理處的負責人說，村莊的存在正受到威脅。這塊土地的主人倒並不在乎這個垃圾堆，但是對工人的房屋却很介意。他要收回土地，趕走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因此，村莊

的居民十分恐慌，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安身。地主爲了要達到他們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有時“破陋村莊”被燒毀，而縱火的罪犯却很少被抓住。

他們帶我們參觀他們的地方。一切看去都可憐而淒慘。我們忽然想起像這樣的村莊曾經遭受過荷蘭殖民主義者的燒毀。

這些事情真是可怕，簡直不堪想像。這些乾竹篾一定是很容易着火的。

我們依次看了每一所小房。大多數小房都只有一間屋，沙鋪的地。在屋角有一張牀：兩個木架子上鋪着幾塊木板，上面鋪着一條小蓆子。這就是所有的東西了。在一間二公尺寬三公尺長的小屋裏住着全家大小，父親、母親、祖母和兩個孩子。牆上掛着一個小鐵罐。罐上有着一幅一個護士送上一杯可口的可可的圖畫。還寫着幾個大字：德魯斯特—哈拉姆。

這些破屋裏的居民當然不會喝過或吃過可可，雖然可可是他們自己國家的產物。他們找到了這個鐵罐，把它做成燈用。鐵罐，再弄上幾條鐵絲、一小塊棉花和一些油，照亮了他們的家。

我們參觀了許多印度尼西亞人民居住的村莊。它們是人類苦難和悲慘的集中表現。一個村莊比一個壞，有幾個稍稍好一些。但是差別不大。大多數村莊都是驚人的貧困的典型——在這裏，生活毫無樂趣。

在晚上，日常的苦難暫被遺忘片刻；甘茂郎^①音樂響徹了熱帶的夜晚。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們參加了村莊的一次節會。在村莊中央的一塊寬敞的沙地上，舉行了表演。所有

① 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管弦樂隊。——譯者

的人都來了，老的和少的，孩子們乖乖地坐在前面，或者在人羣中擠來擠去，想看到一些表演。在幾盞火油燈的照耀下，印度尼西亞的舞蹈者表演了節目。村莊中最好的舞蹈者在古典的戰爭舞中競相表演他們的舞技。觀眾可以連着看好幾個鐘頭：雙方角力，互相險襲，互相非常靈巧地攻擊。他們的一切動作都像閃電一樣地快。觀眾的興趣大極了，對每一個迅速而敏捷的動作都報以掌聲。

除了這些戰爭舞以外，也有古老的爪哇舞。這種舞比較沉靜，動作非常優美，配合着憂鬱的甘茂郎音樂的節奏。但是一會兒節目又更換了，一些青年男女演奏竹製樂器。當地人把它叫做竹樂隊，很受歡迎。受歡迎的原因是與爭取自由的鬥爭真正聯系着的。為印度尼西亞解放而鬥爭的武裝隊伍自己都有樂隊，可是在第二次殖民戰爭中它們的樂器都被劫奪了。他們設法在樹林裏找新的樂器；他們砍下幾根竹管做成樂器。所以新的樂隊是由竹製的管樂器和槌擊樂器組成的。音樂很活潑，調子尖而刺耳。

在爪哇與蘇門答臘的某些地方，當局以法律與條例威脅着村莊的存在。在泗水，我們也參觀了古朋村，那裏的當局要居民搬家，但是遭到居民的拒絕。在日惹附近，我們曾經和一些農民談話，他們接到政府的通知，要他們離開鄉村，因為那塊土地要用來修飛機場。

人民的利益總是比什麼都不重要。

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到處都看到這種情形。不僅是鄉下的農民，而且城市裏的工人也是在非常壞的條件下生活着。我們的工會朋友收有許多關於工人的可怕的生活情況的材料。有一位工會朋友給我們看印度尼西亞統計局的一份有趣的調查表，上面所記載的正是我們在這裏每天親眼看到

的事情。

根據統計，一個印度尼西亞工人的平均工資只够必需的生活費用的 16.2%。所以一個印度尼西亞工人所得只能購買他六分之一的生活必需品。當我們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再也不會對有幾家報紙所說的五分之一的人民長期營養不良而感到驚奇了。

不僅在爪哇是這樣，在其他島嶼上也都是這樣。最富饒的地區處在驚人的貧困中。我們曾經到過巨港，這是被許多詩人歌頌過的城市。我們在各種書中看到，巨港的人都住在建築在木樁上的高腳樓裏，但是這些書都沒有告訴我們，也有人住在這些高腳樓的底下木樁與木樁之間的。

誰也沒有告訴我們這種事，我們是親眼看見的，而且巨港的市長也談到過這點。巨港的三萬居民住在高腳樓底下，木樁與木樁之間的泥地上。有 34,000 人根本沒有房子住。這城市的 10—20% 的居民患着肺結核病。在這個三十萬人口的城市中只有一所醫院，而且是天主教的醫院。然而，巨港還是一個富饒地區的城市……假使乘船溯河而下，不到半小時，就可以到達斯泰文公司和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大煉油廠。在附近還有格龍河和柏拉山，在那裏，外國公司從土地裏榨取財富。利潤高得驚人。

在一幅像神話裏的寶藏一樣的背景前面，一些愈來愈窮的人民正在演着一幕悲劇。印度尼西亞的失業人數正與時俱增。雅加達的勞工部宣佈：“失業人數有一千萬。”但是根據印度尼西亞總工會與其他行業組織所公佈的數字，人數要多得多。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只有一小部分失業人口是登記了的。還有幾萬人是半失業的，一星期只有幾天工作。

我們在雅加達的港口丹絨不錄看到了這些人是怎樣生活的，在那裏，我們參觀了所謂的聯合村。

我們是早晨到的。住在那裏的工人在我們未到以前已經等了好幾個鐘頭了。在這個村莊裏住着的印度尼西亞人都是荷蘭輪船公司的工人。整個地區都是“荷蘭”輪船公司、荷蘭皇家輪船公司與皇家鹿特丹—勞埃德公司的財產。但是這個村莊裏却沒有一點“皇家”的氣息。

我們受到勞埃德公司的一位先生和幾百個工人以及工人們的妻子兒女的歡迎。

那裏的村長告訴我們說，有 8,000 名工人住在這裏；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共有 14,000 人。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證實了這一點。這些工人每天的工資是 4.25 印度尼西亞盾。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一位負責人又作了補充說明：他們大多數每星期只有三天工作，因此，他們只收入十三個印度尼西亞盾，相當於四個多荷蘭盾。

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似乎無動於衷。

由輪船公司指派的村長急忙對我們說：“但是他們有免費的房子住，而且他們還領到米。”我們很幸運地有機會看到這裏所謂的“房子”是什麼。我們走進矮小的破屋。居民靜靜地望着我們。二公尺見方的房間裏要住上七口人。勞埃德公司把這些破屋叫做“房子”。有一間長三公尺寬二公尺的房間，住着十口之家。我們走進去又走了出來，到處人們都請我們進去。有一個工人說：“請看一看我們的雞窠。”

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若無其事地站着。

我們走到市區的大街上，那裏屹立着一幢白色的大房子。有幾十個婦女和小孩手裏拿着籃子和鐵罐在窗前走來走去。有的手裏拿着一張紙。他們在等待着食物。已經快十

二點了，米飯馬上就要分發了。幾個村裏朋友領我們走進這所石頭砌的房子。裏面很熱。在煮飯的廚房裏，充滿了蒸氣。就要分發的米飯盛在草籃裏。旁邊有小碟的棕色的炸魚。

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指着籃子說：“這就是米飯。”他最好在我們嚐這些灰色的東西時再說出來，因為那時是需要解釋的。

我們都從籃子裏拿了一撮飯。米飯夾生，而且粗糙、黏牙而難嚼。有人在說：“沒有煮熟呢！”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望着站在外面等候的人說：“假使我們多煮一會兒，他們也要抗議的。”有幾個小孩把鼻子頂着窗門望着。“這米不好。”勞埃德公司的先生受不了。

“這是頭等大米！”

“你意思是說這是印度尼西亞米嗎？”

“不，這是葡萄牙米。”

“從什麼時候起葡萄牙米是最好的米？那末，為什麼不拿到荷蘭去賣呢？”

“荷蘭？……”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對這樣天真的話大笑不已。“那是不能比的。對這種人來說，這實在是很好的米了。”

我們想起了喀喇蚩！他說到“這種人”的時候，他的嗓子裏有一種特別的聲音。我們已經是屢見不鮮了。在和幾個荷蘭殖民者、種植園老闆和外國企業的高級職員的談話中，只要他們一談到印度尼西亞人，他們就非常正經地說“這種人”。那是一種特別的人，這種人的思想與感覺都是不同的。對一般人是壞的東西對他們已經是够好的了。我們還記得和一個橡膠園老闆的談話。當我們對惡劣的居住條件提出批評時，答覆也是：“這種人”就不能和別的人相比的。

他還說：“而且他們不把房子打掃乾淨。”但是房子是竹子造的，刮風的時候，塵土都從竹子縫裏吹進來。一個印度尼西亞婦女在掃地，她只是盡盡人事而已，那裏的塵土像撒哈拉沙漠一樣掃不完的。但是種植園老闆還是不滿意。

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是同一種人物。

村莊的居民告訴我們：“我們曾經一再地爲食物提出抗議。魚也不是好的，常常是腐爛的。”的確，魚看起來很不新鮮。從白房子裏分發出來的食物都是次等的。我們一走出大廈，一大羣村民就擁着我們往前走。

一個村民告訴我們：“到水井那裏去。”在叢林中大路的一塊空地上，我們看到一個石製的洗滌盆。那裏有一個水龍頭，從早上四點至七點供應水，14,000人每天只能在三小時內從一個龍頭上取水。而這個地方是在熱帶……這就是荷蘭輪船公司怎樣照顧它們的雇員的情形。住在那裏的印度尼西亞工人對這班荷蘭資本家的憎恨還用得着奇怪嗎？

一個老工人告訴我們：“在汲水時，我們必須遵守紀律。你們知道，有時爲了水我們幾乎打起來。這是不對的。但是你們想汲一些水，就不得不這樣。”

當然，這不是人民的過錯。他們並不是不守紀律的。應該受到譴責的是那些犯有在一個14,000居民的村莊中只裝一個水龍頭罪行的入。

米很壞，魚也腐爛了，而且14,000的居民只有一個水龍頭。但是據荷蘭報紙的記載，這是爲荷蘭輪船公司創新紀錄的一年，皇家鹿特丹—勞埃德公司的利潤也提高了。

在一些村莊房屋的屋頂上，紅旗在飄揚着。當村民向我們獻花時，我們感到慚愧的是：對這些罪行應該負責的資本家就住在我們的國家裏。我們像朋友般的擁抱起來。我們不

得不答應我們以後或許還要回來。

羣衆叫喊着，歌唱着。

勞埃德公司的那位先生孤單單地站在後面，只觸了一下他的太陽帽。

五 文諾沙里的人民瀕於死亡

教授是聰明人。

他們喜歡用科學的方法來處理事務。這是很可欽佩的。例如，在戰前許多荷蘭教授曾經徹底地調查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糧食問題。當然，這調查是從一個絕對的科學觀點出發的！其中有一位萊登大學的教授發現，印度尼西亞人的食品所含有的維他命、蛋白質、和卡路里單位比荷蘭人的爲少。他很清楚地看到，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每天所吃的東西要比其他國家的人平常所吃的東西少得多。有許多人每天只吃一餐。這件事使這位教授想了一想。從而他得出了一個聰明的結論，即印度尼西亞人吃得確是少一些，但是他們需要的食物也比較少，因爲他們的身體瘦小，體重也輕。

於是，這位教授有了一個以簡單原則爲根據的很有興趣的講授題目：吃得少體重就輕，體重越輕所需食物就越少……。

這就展開了走向新的和未知的前景的道路。從長時期來說，糧食會變成一種多餘的奢侈品，並意味着整個經濟的一種革命。

和我坐在一輛車裏的從雅加達來的年青工會人員對此放聲大笑起來。他說：“住在印度尼西亞的外國資本家頭腦

裏充滿了這種理論。最壞的是他們也想應用這種理論。我國的情況證實了這一點。許多醫生會告訴你，20—25%的人口是長期營養不良的。有一位醫生預測說，如果情形照這樣下去，印度尼西亞人不久除了雲霧眼睛以外什麼力氣也沒有了。”

一位給我們診治瘧疾（在熱帶瘧疾是很流行的）的雅加達的醫生向我們說，他的病人中絕大部分都患有肺結核。他又說：“雅加達充滿了肺結核的病人。”

“你不久將親自看到實際情況，我們正要前往飢餓——水腫病的地區”。當從雅加達來的那位朋友這樣說時，他的臉色顯得很嚴肅。車子沿路疾駛着。在我們經過的地方，塵土飛揚到空中高達數公尺。太陽似乎比往時酷熱無情。

我們以很快的速度前進，我們的司機歡喜趕路。在爪哇島的中部，道路修得很好。從雅加達和梭羅來的路途上，汽車甚至可以到達爪哇島最偏僻的地方。汽車路甚至都通到墨拉比——墨爾岩務山區，這是我們從遠處時常看到的深山。

在企業（這些企業時常是位於山坡之上）附近的道路是最好的——有時甚至是柏油路。資本家和整個的殖民政權為爪哇和蘇門答臘修築了巨大的公路網，以便儘速地將許多熱帶產物——它們利潤的來源——從企業運到港口去，以及為了使用軍隊控制這個廣大的土地並維持神聖的殖民地“秩序與和平”。為了這一切是值得費力去修建道路的。非常發達的鐵路網——在爪哇島尤其稠密——和許多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情形比起來是迥然不同的。

在沒有許多企業的蘇門答臘的地區，像亞齊，就很少去注意道路了。在那裏，有許多地方汽車不能到達而且時常又沒有鐵路的腳接。

在加里曼丹和蘇拉威西，交通是很不發達的，因為這地區是難於通行和蠻荒的。

現在道路逐漸地高起來了。我們正向高原駛去，我們一定是到達了基杜爾山的管轄區內。

坐在司機旁邊的農會人員轉過身來遞給我們一張地圖。因此，我們可以詳細地觀察這個地方。

基杜爾山大部分是山地。在北方，以一座座的小山為界，其間有成片的梯田。南方有巨大的“千山”，轄區的中部是柏拉炎、文諾沙里、斯馬奴平原，那裏的土壤主要是黑泥灰土與白堊。

這是一個貧瘠的地區，人民很貧困。官方的報告中把它叫做一個“賠錢”地方，即一個需要花錢的地方。“賠錢”地方這句話有些生意經的味道，然而沒有人為此感到不安。實際上對許多人說來，這是一種死刑。

在這句話的背後隱藏着成千成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無窮痛苦。過去或現在都沒有幫助過這個賠錢地方的人民。凡是外國資本家、咖啡和茶葉大亨不能夠取得巨額利潤的地方都受到了可恥的忽視。他們時常派調查委員會去搜集關於糧食情況的數字，對一些人進行體格檢查，然後返回雅加達，寫一份調查結果的報告，把報告存在政府的檔案裏非常仔細地保存起來，以免太多的人看到這份報告。一切就是如此而已。

1941年，荷印政府的一個委員會曾宣稱，基杜爾山的糧食是絕對不足的。該報告說：“當然不用說，上述的身長日益減縮是由於營養越來越壞所致”。但是，並沒有改善這種情況。

這裏的景象非常淒慘，一切看去都是乾枯的。在印度尼

西亞幾乎到處所具有的自然界的豐盛情況，這裏却是沒有。

在路上，成羣的婦女和兒童慢慢地走着，他們像牲口那樣負着重載，枸醬檳榔的紅色汁液從他們的嘴裏淌了下來。在汽車駛過的時候，他們就停下來，並且保護着他們的臉免受灰塵的打擊。

文諾沙里城是貧困的典型。但是在大街兩旁的兩幢東倒西歪的房子中間橫掛着一條大標語：“工會聯合會萬歲！荷蘭工會聯合會萬歲！印度尼西亞總工會萬歲！”其中一幢房子外面掛着一面紅旗……。

農民協會總部的地點是在城邊，我們在這裏下了汽車。這是一所很簡單的用竹子建築的鄉村房屋，屋頂是幾塊洋鐵皮，因此屋裏熱得難於忍受。我們在圍成一個圓圈的板檯上坐下。

我們的主人給我們一個椰子解渴——椰子的汁是很珍貴的，普通的水很難找到，所有附近的兒童都擠在敞開着的門前，他們怕看不到我們的動作。他們不了解我們，但是却用聰明的小黑眼睛注視着我們的每一個動作。兩個白種人，長着高鼻子，這是一件他們不願意錯過的引人注意的事。文諾沙里農會的領袖之一向我們談到那個地方的情形。

那裏 80% 左右是丘陵和山嶽。只是在山的中間有幾片農田。洪水時常猛烈地沖出來，大部分田地的泥沙都被沖走了，只留下了石頭和白堊。在上次戰爭中，大部分樹林被摧毀了。沒有樹林的地方，雨就很少……。

因而，農業的情況很壞，收成日益減少。甜馬鈴薯、花生、烟草、洋蔥、胡椒、和豆子是到處生長的作物，這種作物是被運到外區去的。該區大米的產量只敷居民幾週的食用。451, 794 名男子和婦女是在勤勞地工作着，為生活而奮鬥

着，但是他們却在挨着餓。他們幾乎都是農民。

我們問道，“除了農業，還有其他謀生的方法嗎？”這位農會的領袖點點頭。

那裏有少數家庭工業，尤其是織布。他想了一會兒，痛苦地接着說，“但是，織布也就要幹不成了。”大多數爪哇人談起話來很從容。他們不慌不忙，考慮要說的話，謹慎地表達出他們想說的話。

“在這些地區裏，我們一共有 6,013 台織布機和 25,000 架紡車。人民一直很勤勉地工作着。長期以來，這是我們許多人的微薄的但很重要的收入。但是，目前它正在迅速地衰落下去。印度尼西亞的紡織品不再需要了。美國人和日本人的紡織品充斥市場，而政府並不設法加以阻止。

“在城裏，你將看見這種情形，各處都充滿了外國的紡織品。這意味着印度尼西亞紡織業的衰落。對於我們的地區，這是一種災難，災難是我們所僅有的幾件事物之一。”

“在這裏，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糧食和水。”

文諾沙里地區的居民都瀕於饑饉，並且他們要作巨大的努力以免於渴死。在目前有 682 人患着水腫病。這是傷害健康的飢餓病。醫院中患着這種病的 78 個病人已不可救治。其中 6 人已在前幾星期死去了。

那個地區的許多居民處於疾病的邊緣上。

他們被稱為飢餓—水腫症的候補人，而且患這種病的人似乎是沒有痊愈之望的。整個地區是在飢餓的威脅之下。道路是荒涼的。到處有幾個兒童站在路的旁邊，他們是那變瘦削而且骯髒。當着他們看見了我們的車子，他們便揮着手，並且跑到破爛的茅屋裏去告訴他們的朋友們。

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是生氣勃勃的。他們笑、作鬼

臉、團團轉地跳着。他們是非常可愛的孩子。

現在，我們到達了灰色和可怕的“千山”脚下的一片凄慘的沙漠裏。這是一羣成百座穹窿狀的山，像成百個峻峭的穹窿，沒有任何意義，禿而崎嶇。

它們看去不像是真的，彷彿是僵化了。

大家都下了車。農會的領袖說，在附近有一條地下河。我們看見一小羣一小羣的人沿着小路慢慢地向前走，他們肩上挑着一條竹扁担，兩頭繫着兩個鐵罐。他們從遠近各處來汲水，有些人來自20—30公里遠的地方。

在“千山”地區很少下雨，即使在下雨的時候，也只能積得很少的雨水。取水必須很快，因為白堊質的土壤有很多的小孔。在路的左邊有一個小山谷，有兩個婦女沿着一條曲折的小徑走下去，我們緊跟在她們的後邊。

我們必須很小心地看着腳步，從一塊石頭走到另一塊石頭，並且用力保持身體的平衡。在山谷的下面有一個黑暗的山洞，在通過山洞時這兩位婦女的踪影消失了。洞裏是漆黑的。在石壁上有一條小蛇在爬行，我們順着一縷亮光恰好看見了它。在那裏汲水的人要爬下好幾公尺才能達到地下河，而這山洞是唯一通地下河的地方。當這兩位婦女回來的時候，她們的罐子裏盛滿了濃濃的褐色液體。這就是文諾沙里城的飲水。

我們藉翻譯的幫助設法和她們談話，但感到很困難。我們唯一了解的是，她們先把水煮沸，等到渣滓沉澱下去然後飲用。

在這兩位婦女之後，有幾個兒童和一個男人也來汲水。他們沿着同一條路走下去，一直走到深處。

在印度尼西亞這一地區有着許多地下河。它們有時在

十五公尺的深處而且很難到達。在一個鄉村裏，我們看到人們所吃的東西。這使我們感到憤恨和慚愧。花生的葉子、昆蟲的排泄物、印度洋的海藻就是文諾沙里人的食品。他們當心地把這些食物盛在香蕉葉子上給我們看——當心地，因為他們不願意讓它潑出來，甚至這種食品都是很稀少的。

但是，這個地方的慘象——可恥與殘酷的殖民主義所造成的慘象——還不止於此。

我們的嚮導引導我們沿着一條狹窄的鄉村小路向前走，經過一個小樹林到達一所東倒西歪的房子，這房子是在幾棵香蕉樹的枯萎的葉子後面。這是醫治飢餓—水腫症患者的急診醫院。這醫院謹慎地隱藏在這裏，和外界隔離起來。我們推開了那張蕨葉做的門。我們走進一間陰暗的房間，房間是竹子築成的，頂上蓋着葦草。房頂上有許多大窟窿，下午的陽光從窟窿裏照進來，在下雨的時候，雨水便從這裏流下。

地板是用軟沙鋪成的。沿牆擺着幾張牀鋪——木架上木板搭成的牀上面鋪着一張小草蓆——病人便躺在那些牀上。其中一個是十六歲的孩子，他的兩隻大黑眼睛向前注視着。他的兩隻腳腫得很大。他告訴我們說，他想回家幫助他的父母種田，他的父母也正在等待他並且需要他。在其他的牀上躺着年歲較大的人，有些人的旁邊放着一碗米飯。他們的身體發腫，他們的眼睛發炎。

這個“醫院”有兩部：一部是男院，另一部是女院。有幾位志願的工作人員，他們把東西收拾得很整齊，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受過護士的訓練。唯一的醫療助手是一個青年人，他每天早晨來兩小時。當然那裏也有一位醫生，但是人們在好幾個月裏只看見他一次。他們說，過幾天醫生就會回來。

躺在這裏的二十二個病人是按照一種簡單的辦法來治療的；每天三餐，每餐一碟米飯，時常給予一片維他命藥片。這是他們所得到的唯一治療。他們住在這個偏僻的角落裏，沒有任何專家診治。

我們不願意談話。情形是這樣地可怕，我們簡直不敢信以為真。這是我們親眼看見的情形，它正像一個可怕的夢魘。可是，這是真實的。這是沒有戴假面具的真象畢露的殖民制度。

在我們回去的路上，我們看見兩個小女孩和一個婦女在一片貧瘠的土地上拉着一個木犁。這是一件非常沉重的工作，這婦女和兩個孩子必須用盡力氣來作這件事。他們艱苦地往前拉，可是木犁走得還是很慢。

他們在這裏耕種的土地所出產的東西和他們的祖先所得到的並不一樣。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耕耘和播種，一次又一次耐心地等待收穫，可是收穫却越來越少，而歉收的次數越來越多。

從雅加達來的那位朋友從深思中甦醒過來了，他說，“一次好收成並沒有很大幫助，那是不夠的。幾乎所有的農民都負着重債，因此，他們的手腳牢牢地受着高利貸者和地主的束縛。高利貸者和地主要他們償還全部債務。在文諾沙里，重要的事情是怎樣供給他們糧食。但是，那並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的司機煞住車，農會人員該在這個十字路口下車了。他含笑地和我們握手。“不要忘記文諾沙里的人們，如果你們想知道什麼事情，給我們來信。我不久就要到日惹去”。我們握着手，在這個寂寞的十字路面上和他分別了。

從日惹來的那位朋友說，“他工作做得非常好。越來越

多的農民組織起來了。那就是我們所談論的解決辦法。工人和農民必須一起爭取做到這件事。”

這是一個離奇的日子。我們在一個富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國家中，驅車經過一個人民瀕於饑饉死亡的地區。今天，外國企業裝載原料和農產品的船隻一定又從丹絨不錄和泗水的港口開出了。只要外國企業得勢一天，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政策為它們服務一天，印度尼西亞人民就要遭受貧困和飢餓。

在日落的時分，我們回到日惹。我們沿着商店林立的街道和市場向前行駛。在商店裏和路旁的攤子上都有米。

這就是文諾沙里人正在盼望的白米。

六 爭奪蘇門答臘的鬥爭

拖拉機在狹窄冷清的鄉村道路上開動着。這些笨重的機器的格格格格的聲音打破了沉靜。大片塵土尾隨着這小隊的拖拉機。太陽炙熱地照着。在這隊拖拉機的後面，有兩個荷蘭種植園的老闆乘着一輛吉普車，正在揩拭他們額上的汗水。汗水混着塵土。吉普車上下跳動，因為道路是凹凸不平的。婦女和兒童跑過田野來觀看這個小小的行列。在冷吉的安靜的農業地區，外來人是很少的。因此，在這個9月的早晨，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幾輛裝着機動隊士兵的載重汽車在100公尺的後面跟隨着那輛吉普車。那些士兵是印度尼西亞人。他們全部武裝着。一個軍官坐在司機的旁邊。他指着遠處。

汽車隊沿着塵土飛揚的道路不停地向前駛着，也不問

路，它們顯然是知道它們的去處的。它們在寶璋岸村停下。兩個種植園老闆下了車，走到路旁，那裏有着六所農民的茅屋。在每所茅屋的周圍有一片田地。一個印度尼西亞譯員走到農民們正在靜靜工作的土地上。他的舉動是侷促不安的，談話立即開始了。

他時常指着種植園老闆和他們的武裝隨從站立的地方。從各處聚來的婦女和兒童用心地聽着。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他向農民說，他們必須即刻離開那個地方。日里種植人公司是這地方的土地所有人。

貧苦的農民們在革命期間佔有了這些土地。現在，他們耕種這些土地已經好幾年了。但是，今天末日來臨了。談話費了相當的時間。農民們似乎並不了解。

同時，農民們繼續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裏。全村的人都會集到了那個地方。男子、婦女、兒童、所有的人都跑到那片受到威脅的土地上。種植園老闆似乎有點着急。他們和印度尼西亞軍官們交談。然後拖拉機立即在土地上開動起來，一直向幼小的作物開過去，這些作物在重大的壓力下立即折斷了。拖拉機對準一所農民的茅屋開去。

一所茅屋被撞壞了。竹子裂開了。一垛牆塌下來了，其餘部分跟着很快地倒下來。種植人協會的人員注視着。士兵們試圖驅散羣衆。但是，他們沒有成功。

一塊石頭從空中飛來。那是一個總信號。接着一切都開動起來了。500名農民一齊跑上來。他們向拖拉機投擲石頭。一輛拖拉機想撞壞另一所茅屋，但是雨點般的石頭、木塊和泥土不斷地落下，終於把拖拉機擊退了。

響亮的叫喊聲四處可以聽到。雙方動起武來。農民們盡着他們的全力來抵抗。種植園老闆採取了走爲上策的辦法。

在警察的保護之下，他們跳進了吉普車。和他們來時那樣迅速地逃跑了。機動隊的士兵也無能為力，他們開着車保護着種植園老闆以防遭受貧苦人民憤怒的和仇恨的攻擊。

一所茅屋被撞倒了，大部分農作物被毀壞了，但是土地仍然是他們的。

在表面上安靜的北蘇門答臘的土地上，這種事件是時常發生的。這是關於爭奪該島財富鬥爭的一部分。在簽訂海牙圓桌會議協定之後，外國企業收回了大部分它們原有的土地；大部分的種植園重新開辦了，並且恢復了原狀。但是，資本家對這點並不滿意：他們認為所有的土地必須歸企業所有。蘇門答臘的一切財富都應屬於外國人！

在任何其他地區，外國帝國主義者與印度尼西亞人民利益上的矛盾，都沒有像在蘇門答臘表現得那麼明顯。

但是，蘇門答臘的農民不願意再度交出他們的土地。他們是合法的所有人，他們已經取得這塊土地，決不再把它交出來。

印度尼西亞當局和日里種植人協會及阿姆斯特丹貿易公司一起擬定了一個“土地改革”計劃。這個名詞是很好聽的。土地改革就是要蘇門答臘東北部的農民交出他們已佔有的 25,000 公頃土地，他們將得到沼澤地作為交換。但是，沼澤地是不適於耕種的。根據這種辦法，蘇門答臘農民的簡單生活將被“改革”成為絕對的貧困，農民對這種改革是毫無好感的。

有些企業拿出了幾塊因長期耕種而耗竭了的土地，這些土地對於它們再沒有用處了。“交換”這一名詞同樣只是一個政治名詞，是用來緩和農民的反抗的。所有的農民的組織——除了瑪斯友美黨的組織以外——堅決不接受這種辦

法。

這個地區的農民組織很強大。進步的農民組織印度尼西亞農民福利會的幹事告訴我們許多有趣的事，他陪着我們周遊蘇門答臘各地。在北蘇門答臘省，印度尼西亞農民福利會和印度尼西亞農民陣綫是最大的組織。印度尼西亞農民福利會有 30,000 名會員；印度尼西亞農民陣綫有 60,000 名會員。

各種農民組織的地方分會都是密切合作的。它們甚至有着合併的計劃。

這裏有許多農民種植大米；他們每十個月收穫一次。在兩次收穫期的中間，他們也種花生與木薯。他們必須辛勤地工作來維持生活。賦稅是農民的沉重負擔。

在有些地區中，農民每年須交給村長 62.5 公斤大米，神父 15 公斤，交納水利工程費用 15 公斤，公共工程費用 15 公斤。地主掠奪着農民。某些租用大地主土地的農民要付給地主三分之二的收成。這種制度遭到了很大的反抗；在許多地方，農民正進行着反抗。

在我們來這裏訪問前幾個月，農民中曾發生了一個要求改善大米分配的强大運動。農民舉行了要求改善糧食供應的示威，並要求農民的利益要先於外國企業的利益。

當局選定一位農民的領袖來進行報復。機動隊企圖逮捕上述的農會幹事。但是，一羣 2,000 個農民圍住他們的領袖，保護他不被警察接近，警察只好空手回去了。農民們把這些實例記在心中，他們越來越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

同時，外國資本家對於這種情勢並不甘心。他們的一切作為、一切措施都意在破壞農民的反抗，並對於這個巨大的蘇門答臘島上的所有土地與所有財富樹立他們自己的無限

權力。這就是一切衝突的根源。

印度尼西亞農民福利會的幹事告訴我們說：“幾個星期前，有一百個農民被捕，因為這些農民都拒絕離開他們的土地。但是，由於農民們的強烈反抗，他們又獲得了自由。現在，他們又在耕種着他們自己的土地了。”

日里種植人協會和阿姆斯特丹貿易公司不敢在全綫進攻。它們只是在一些地方試圖用暴力來收回土地重歸企業管轄。到現在為止，他們大部分的努力已經失敗了。

在蘇門答臘東北部的遼闊土地上滿佈着外國企業。這裏的土壤是很肥沃的，有巨大的油田、貴重的礦產，它是印度尼西亞最富的地區之一。

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動脈在這裏跳動着。種植園的產品從勿拉灣港運出。稠密的外國農業企業（尤其是烟草、橡膠、糖與茶葉）網佔有了全部土地。為外國企業服務的印度尼西亞農業工人估計有五十萬人。這就是說：他們受到了無限制的剝削。

我們看到採茶和揀茶的婦女們正在工作。那是一幅如畫的景象，婦女們戴着大草帽，把孩子裹紮在背上的長長的圍巾裏。她們在熱帶灼熱的日光下工作，一日所得只有一盾，等於荷蘭盾的三角五分。揀茶的人必須把茶葉從大筐裏一片一片地揀出，她們僅得半盾——計合荷盾一角七分半。

這是在一家荷蘭企業裏的情形！

婦女們不很說話。她們有時小聲地說幾句。監工站在她們的後面。

在村子邊上，開了一個盛大的集會歡迎我們。這個村子和上述的企業的土地連接着。村裏最好的舞蹈者表演了一場龍舞，由甘茂郎樂隊伴奏。龍猛烈地搖着頭，向旁邊大跳

步地跳躍，把自己捲成各種形狀，發出響亮的鼾聲，最後馴服地低下了頭來。和龍捲鬥的舞蹈者，把手合起舉到臉前，然後鞠躬。這種歡迎只是給予很好的友人和重要的賓客的。他們和我們一起來到村子裏，在那裏，呆板單調的敲擊木梆聲號召所有居民在村中的廣場集合。在廣場——村中心一塊空曠的沙地——上，我們又受到歡迎。在工會房屋的外邊，我們看見用印度尼西亞文和用荷蘭文寫的“歡迎”標語。集會開始了，但是這和我們通常所參加的集會不同。沒有大集會的儀式，只是在親切的交談。

印度尼西亞總工會人員說着爪哇話，因為所有的居民都是爪哇人。在實行“刑罰條例”^①的時代，他們或他們的父母被帶到蘇門答臘來奴隸般地工作。唯一使他們想起祖籍的是他們的語言，爪哇話。爪哇話的發音和諧而且親切。工會人員和他們談話，他們時常以歌詠般的聲音來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

“這幾個荷蘭人是我們的朋友，你們同意嗎？”羣衆回答說，“同意！”一位老農民大聲地說，“他們不是從荷蘭企業中來的，是不是？”“不是，他們是代表荷蘭工人來到這裏的。”他們不鼓掌。大家同意時，他們就呼喊：“是的”。很像每一個人都參加的私人談話。

印度尼西亞總工會人員在村裏是很孚衆望的，許多居民來和他們與我們握手。只是婦女有些怕羞。最後，一位婦女來和我們握手；其他的婦女則聚在一起站着。她們談笑，

① 荷蘭帝國主義統治印度尼西亞時期，曾用各種辦法從爪哇各地招募苦力到蘇門答臘等地去開墾農場。這些苦力都訂有契約，故又名契約苦力，實際上即是變相的奴隸，農場老闆利用荷蘭殖民當局頒佈的這種慘無人道的“刑罰條例”來虐待那些苦力。——譯者

但不向我們看。按習慣，婦女是不和男人握手的。一位年輕的姑娘仿效那位婦女的先例來和我們握手，隨後其他的婦女也跟着來了。

婦女們仍然受舊封建習俗重重的束縛。只有印度尼西亞覺醒婦女會一類婦女組織的最覺悟的婦女工作人員和會員才自由地活動。

在我們離開以前，農民們拿來了他們的禮品。一個他們住屋的木製模型。“永遠不要忘記這模型，並且把它展覽給荷蘭的工人看。告訴他們我們是怎麼樣地生活着，和我們住在什麼樣簡陋的房子裏。”

我們答應他們一定照辦。

現在，我們乘車經過廣大的樹林；左右都看見廣闊的森林。我們向窗外注視，希冀看見一隻猴子。印度尼西亞友人向我們說，“這裏有老虎、犀牛和猴”。我們很相信，但是我們希望親眼看見，尤其是猴子。但是，它們並沒有出來。

在下午太陽最熱的時候，我們到達了靠近海岸的火火山。當我們經過前荷蘭與印度尼西亞軍隊分界綫的地方，我們的印度尼西亞友人開始了生動的討論。其中若干人曾經長期在這裏日夜警戒過。時常發生小戰鬥，他們中有許多人被殺死了。印度尼西亞農民福利會人員告訴我們說，荷蘭軍隊常常首先被派到擁有着巨大財產的企業的地方去。他知道這事，因為他幾年來參加了這一鬥爭。“糖廠、煉油廠、廣大的橡膠種植園，荷蘭參謀部總在那裏計劃他們的路綫。”

這一規律不只適用於殖民軍隊，而且也適用於整個殖民政策。“別人的咖啡，別人的茶葉”，這兩句南非歌謠中的話同樣也指出了爲什麼荷蘭青年必須進行一個毫無意義的戰爭，在這一戰爭中那麼多的人犧牲了。印度尼西亞農民福

利會的人員說，“但是，在火水山，荷蘭參謀部犯了錯誤”，而且當他談起了殖民戰爭時，他就不能停止。“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用一種迅速的行動來取得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煉油廠。但是，當着殖民軍佔領煉油廠的時候，立即發生了大火，毀壞了油廠。”

在過去，煉油廠遭火毀壞已達好多次了，第一次是在日本人閃電般地進攻印度尼西亞，並且在很短期間征服了全國的時候，爲荷蘭當局所毀。其後是爲英國人所毀，英國人從海上轟擊這個對日本人有重要戰略作用的企業。最後一次是爲印度尼西亞人所毀，但他們在荷蘭軍隊的壓力下不得不撤退了。

這地方的景象是很淒慘的。在我們所能看得到的地方，都是廢墟、斷牆殘壁、部分的舊有設備。在廢墟當中，草長了好幾公尺，長得比殘餘的機器還高。廢鐵散在各處，這是一個大工廠的廢墟。我們走過煉油廠的基地，那裏沒有完整的東西了，“焦土”戰術作得很有效。在荷蘭殖民者的軍事行動中，煉油廠沒有再度發生作用。印度尼西亞人的行動非常激烈，但很有效。

在火水山有著名的自動油礦，這地方充滿了價值很高的石油，不費多大困難就可以採得。企業的工人仍在工作着，他們把開採的工作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們自己組織起來進行開採的工作，雖然這工作是在一個政府委員會的管理之下，這委員會是工廠的真正經理。

因爲沒有設備，石油不再加以提煉。這種石油不經提煉即行出售，完全供國內消費。但是，工人們要求重建煉油廠並修理整個工廠以便作爲一個國營的煉油廠來重新開始工作。他們等待這樣一個決定已有兩年之久了，許多政黨贊成

工人的要求，有些却猶豫不決，還有一派人反對這樣的請求，但是他們不敢公開提出反對，因為他們害怕工人的正當不滿。

在幕後，陰謀不斷在進行着，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代表力圖影響印度尼西亞的政治領袖，並企圖把工廠歸還皇家殼牌石油公司。他們既不惜金錢又不惜努力，它念念不忘蘇門答臘的石油。皇家殼牌石油公司順便告訴一切願意聽的人說，它要收回煉油廠。它使用了重大的威脅和花言巧語。在沒有作出決定以前，現狀繼續維持下去。300名工人繼續開採石油，由於缺乏必要設備，開採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每24小時出油60噸）。政府不願意把該企業收歸國有並加以修建以滿足工人的要求，如果這樣做，則將來可以僱用3,000名工人，並且每24小時的生產可增至4,000噸。

工人們正在等待着……。

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沒有放過在火水山工人和該區居民間進行宣傳的機會，告訴他們當皇家殼牌石油公司重新擁有這企業時，他們將獲得的好處。

荷蘭議員古德哈特從印度尼西亞返國後說，他和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一個代表被詢問了許多關於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問題，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是否將重新掌握這些企業，工人是否將被允許為皇家殼牌石油公司工作？

這類事顯然只有古德哈特先生和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代表才遭遇到。那種對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忠誠可能是專門準備在特殊場合表現的；無論如何，我們所聽到的是恰恰相反。

工人，尤其是其中年紀較老的，對於該石油公司的情況記得很清楚。他們告訴我們，皇家殼牌石油公司付給印度尼

西亞人最低工資是每月 12 荷盾，但是歐洲人的最低工資是 300 荷盾。這就是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優良待遇！

工人們要求政府把火水山、冷沙、蘭多、爪拉辛邦的油井和煉油廠收歸國有。人民注視着皇家殼牌石油公司、荷蘭高級專員和印度尼西亞政治領袖們正在運用的一切政治手腕。毫無疑問，人民是主張收歸國有的，雖然古德哈特先生和皇家殼牌石油公司不喜歡這種意見。同時，工人們正在盡可能地增加生產。他們正在盡可能地開採石油。

在靠近海岸的工廠基地上，有許多小水池。我們從遠處看見白色的水蒸氣像霧一般垂懸在石槽上面。池裏注滿了海水，在石槽下面燒着火用以蒸發水分。半裸着身體的工人正在爐下生着火，在這種熱度——火爐的熱和垂直在火爐之上的太陽的熱度——之下，這是一種非常沉重的工作。在火水山，鹽就是這樣製成的。這種鹽是供應國內消費的，尤其是供應本地區人民的消費。

工人來和我們握手。他們知道我們不是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派來的，而是荷蘭工人派來的。他們是辛勤勞動的人民，他們一定能夠把石油工廠建築成一個巨大的國營企業。他們願意把他們的力量和精力貢獻給這巨大的國營企業，而不願意貢獻給皇家殼牌石油公司。這點對他們說來已是一個解決了的問題。從火水山到現代歐洲式的城市棉蘭，坐汽車只有幾個小時。我們學了幾個印度尼西亞字，“晚安”、“吃”、“喝”……來消磨這段時間。我們的印度尼西亞朋友讀出音來，我們跟着唸。這是很好的練習。

我們的司機突然叫喊說：“它們在那裏，在左邊”！

我們看見了第一批猴子。

一起三隻棕色的小山猴。它們安靜地坐在路旁，在一個

大的椰子種植園的前頭。它們搔着它們的頭並且注視我們的車子。它們覺得很有趣，沒有一點害怕。

現在，是老虎了……。

七 中國的面目

我們還看到了老虎——在印度尼西亞有最兇惡、最貪婪的老虎。老虎不是在原始森林裏，而是在極開化的地方——北蘇門答臘省省會棉蘭。

它們住在白色大廈裏，它們的名字用金色字體寫在牆上：荷蘭貿易公司、日里種植人協會、阿姆斯特丹貿易公司、愛夫羅公司等等。

看起來好像一切都是由它們的掌握之中；它們的辦公處滿佈整個城市。沿着一切大路以及在這裏商店林立的許多熱鬧街道上，人們可以看到它們的辦公大樓。

棉蘭是一個現代化的、歐洲式的城市，是專門供外國公司在蘇門答臘設立總辦事處的地方。它是雅加達的延長。這裏比較安靜，擠滿了外國人。旅館裏也是如此。這些旅館完全適應他們的需要，一切都是窮奢極侈。印度尼西亞人自己却偏促在這個城市的狹小而貧苦的角落裏。

有一天早晨，我們在全城漫遊了一週。在熱鬧的市場區，我們有一位的路袋幾乎被人扒竊。在幾秒鐘內，那個扒手便在市場的人叢中消失了。他無疑地具有神妙的技巧。在大多數的印度尼西亞城市中，偷竊和搶劫已成日常現象。人們已習以為常了。一個受害者輕蔑的叫喊和受驚的表情是街頭的常見現象。

我們會到一條大街上想物色一些精巧的紀念品帶回荷蘭去。

有一個印度尼西亞小孩從一家大商店裏跑出來，他幾乎撞着我們。他一隻手裏拿着一包書籍，另一隻手裏小心地拿着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像片。

這件事引起我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便走了進去。那是一家現代的中國書店，出售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寄來的一切新書籍。有印度尼西亞文、英文和中文的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著作。還有毛澤東的像片和人民歌曲唱片。

這種商店在各大城市都可以找到。以後我們甚至在村莊裏也看到過。很多人到這些書店裏去，書店裏總是擠滿了人。

印度尼西亞非常關心在中國所發生的偉大而令人感動的事情。中國對他們有着無可抗拒的魅力。人們理解到這是一個亞洲的民族怎樣擺脫它的鎖鍊，完全摧毀殖民主義而贏得了獨立的一個例子。在這裏當然也有猶豫不決的分子，他們也認為這是一個殖民地和附屬國家能夠用自己力量改變它的境遇並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證明。新中國的面目在印度尼西亞到處可以看得見，而從這種面目發射出巨大的鼓舞力量。在知識分子中，不斷地舉行討論會。不但是中國的書店，而且還有僑居在印度尼西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華僑團體，都顯出了中國的面目是怎樣。

有一位官員告訴我們：根據1930年的人口調查，僑居印度尼西亞的中國人有1,233,000人，現在一定還要多得多。因此，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居民中，華僑也是一個在數目上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人居住印度尼西亞的期間，帝國主義者就努

力——常常是成功地——使當地居民中的華僑和印度尼西亞人互相傾軋，以收漁翁之利。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已被認為是殖民統治的基礎。

大家知道，讓·比埃特松·康恩曾和一個放高利貸的華僑蘇炳康（譯音）有來往。他經常到蘇炳康那裏去喝咖啡。我們很可以這樣說，康恩不是一個親切而好友的健談的人，他之到那家去不只是爲了喝咖啡，而是更因爲他曾經一再說過的：中國人是“那麼有用處的”。

東印度公司鼓勵華僑在雅加達定居。當中國人不願在那裏居留的時候，那家公司甚至從別的地區輸送華僑到雅加達來。

在過去的年代中，帝國主義者利用成千的華僑爲廉價勞工。它們把一些特權給了許多華僑小商人，以防止印度尼西亞的中產階級的形成。另一方面，他們在以瀾天大謊欺騙了印度尼西亞居民之後，又慣於轉移印度尼西亞人的仇恨情緒。

雖然帝國主義者努力利用華僑中的某些集團——特別是小商人——來達到它們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華僑把他們的地位擴張得太厲害，或者不能像奴隸般的聽從的話，帝國主義者便毫無顧忌地對中國人施以無情的壓迫。

有一位史學家的話最能描寫當時華僑的地位。他說，1700年，華僑被指定的居住區是在雅加達附近一條河的西岸，因爲那個地方是“我們（荷蘭人）的大砲所能及到的”。

帝國主義者想利用華僑，但是華僑想改善他們地位的每一次努力，都被武力鎮壓下去了。

1740年，荷蘭殖民當局在雅加達（巴達維亞）進行了一次可怕的屠殺。1840年的荷屬東印度的雜誌中曾有下面的

記載：

“那時所發生的可怕的事情誠非筆墨所能形容。凡屬中華民族的人，不論窮富、老少、有罪無罪，凡是被遇到的人都遭無情殺害。懷孕的婦女、哺乳的母親、無邪的兒童、戰慄的白髮老人都被刀劍所殺戮。這些手無寸鐵的俘虜像綿羊般地被割斷了喉管……不久，火焰和殺戮遍及全城。郊區的情形也是一樣。

“河水被血染紅，屍體滿街，死神到處獍狴橫行……暴行並不因黃昏天黑而停止。受傷者的呻吟、殺人的瘋狂叫喊，徹夜可聞。”

華僑就是被荷蘭帝國主義者用這種方式鎮壓下去的。在殖民戰爭期間，荷蘭人再度對華僑大肆進攻：放火燒毀他們的房屋，又實行劫掠和殺戮。用各種陰謀詭計和激烈的反華宣傳來鼓動印度尼西亞人再度襲擊華僑，以便利用這種騷動而對處在困難情況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採取武力行動，並用這種方式來取得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利益。

由於印度尼西亞爭取自由的戰士們的遵守紀律和明辨是非，這些衝突沒有擴大。因之沒有達到目的。歷史已明白地向華僑和印度尼西亞人證明，他們都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威脅壓迫。現在中國小商人和小企業家尤其認識到帝國主義者是怎樣地危害他們，使他們的商業破產，企業處在危險狀態。我們在北蘇門答臘和邦加島錫礦中遇到的華僑農民和工人現在和印度尼西亞的弟兄們融洽地在一起工作。有人是十分害怕這種團結的。

不同的民族團體——各國體都有它自己的組織和任務——間的合作，使荷蘭帝國主義者深感不安。在丹容勿拉哇曾發生過許多印度尼西亞人和華僑農民被逐出他們所佔

有的土地並在鬥爭中被殺害的事件。這個事件曾經使很多殖民分子要求驅逐大批華僑。這會成爲對當地居民中的華僑集團的新的進攻。但是這不能阻止發展；印度尼西亞人和華僑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他們也了解這一點的。

我們在雅加達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週年慶祝大會。這個慶祝會在一家大戲院舉行，是由華僑團體所組織的。會場內充滿了熱烈的氣氛，不時有自發的熱烈的掌聲。舞蹈節目表現新中國的生活、復興工作、在朝鮮對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還有合唱隊。中國男女孩子穿上潔白的衣服，表演各式各樣的節目。其中最受人讚賞的是一個關於各民族團結起來爭取和平的歌曲，在終了時歡呼：“毛澤東—斯大林！”

這個節目不得不應觀眾的要求而重演了一次。

八 火山沒有熄滅

這天下午我們在一家咖啡店裏歇了一會兒。我們不是唯一的主顧，那裏還有幾個印度尼西亞學生、兩個中國人和一個坐在一邊的只穿一件襯衫的荷蘭種植園老闆。

我們要了冰咖啡，我們的朋友却喜歡加入一大塊冰的茶。不到三分鐘，咖啡和茶都送到了我們面前。爪哇的服務員們穿着白色衣服，戴着著名的共和國小帽，忙着招呼客人。其中年紀最長的一個，面色褐黃而帶皺紋，頭髮灰白，一副令人敬愛的樣子，他從那個種植園老闆面前走過。

“喂，夥計，來一杯啤酒。”那個種植園老闆做了一個命令式的手勢。咖啡店裏的人全都爲之一驚。印度尼西亞服務

員們不願意再像許多荷蘭殖民者的習慣那樣被稱呼爲“夥計”，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年長的爪哇人慢吞吞地走着，望也不望地毫不理會，種植園老闆又叫了幾次，但仍然沒有回音。服務員們儘管做他們自己的工作，完全不去理他。每一個主顧都很快地得到招呼，只有那個種植園老闆是例外，最後，他立起身來怒沖沖地離開了咖啡店。

印度尼西亞各階層人民對於殖民措施和殖民地習慣都深惡痛絕，這種措施和習慣從世紀以來都被認爲是正常的，而荷蘭的種植園老闆們更認爲是永遠不變的。殖民分子現在面臨着一種他們很不喜歡的現實。目前還廣泛地存在着的對印度尼西亞人的歧視態度遭到了嚴重的反抗。許多人不能了解“八月革命”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覺醒所起的影響。

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印度尼西亞爪哇到處碰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這種覺醒：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全部思想都已革命化了。因此，帝國主義者要忍公然無忌地實行他們的殖民措施，現在幾乎是不可能了。“八月革命”失敗了，即是說它沒有達到它的最後目的——印度尼西亞的完全獨立並摧毀封建制度。這一鬥爭仍在繼續進行，並將導致新的革命高潮。

但是“八月革命”大大地鞏固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在爭取自由和反抗外國敵人的鬥爭中的地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處境無疑地變得更爲困難。而印度尼西亞各階層人民在政治上的想法也向前邁進了一步。各種民族組織一天比一天強大起來。在印度尼西亞全國，民族運動的復活將達於無限的程度。

在過去，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曾經歷過許多困難。進

步組織一再被帝國主義者解散，或甚至破壞。在1948年——萊莉芬挑釁事件以後——印度尼西亞的爭取自由的戰士大批地遭受屠殺。特別是在瑪斯女美黨和托洛茨基派的操縱下活動的兇暴的反動匪幫和武裝組織曾殺害了上萬的勇敢戰士；35,000名工人和農民的領袖犧牲了。我們在旅程中看到了很多的墳墓，有些是在僻遠而為公眾所不能去的地方，在那裏埋葬了在這種恐怖中犧牲的人。但是，一切恐怖活動，甚至在萊莉芬事件以後的活動，只能促進進步的民族組織的發展。其中主要是印度尼西亞工會運動，印度尼西亞總工會有了巨大的發展。在萊莉芬挑釁事件（這次事件包括對工會的大規模的襲擊）以前，參加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有17個工會。現在却增加了一倍，即有34個工會參加了總工會，基層組織在10,000個以上，會員總數達250萬人。這是帝國主義者所得到的悲慘後果。

印度尼西亞總工會中最重要的工會之一是種植園工人的工會，即印度尼西亞農園工會，它擁有會員65萬人。80%以上的種植園工人都參加了這個工會。鐵路工會包括了80%的鐵路員工。而碼頭工人、海員和其他運輸工人在總工會之下也大多數組織起來了。這是印度尼西亞的爭取自由的戰士手中的非常重要的武器。

在印度尼西亞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完全依靠着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一旦發生障礙，印度尼西亞的整個經濟也將陷於癱瘓。那時企業即將和種植園切斷，而對印度尼西亞的掠奪將大大受到阻礙，壓迫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行動也將受到阻礙。

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為什麼常常像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地保護運輸，並且不惜任何代價和努力來阻撓工人的團結

一致。他們也曾力圖利用沙里爾的印度尼西亞右翼社會黨來分化印度尼西亞工人和種植園工人。該黨是忠心維護英國和荷蘭資本家的利益的。但是這一切辦法都無濟於事而終於失敗了。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巨大影響到處可以看到，到處可以感覺到。在有些企業中，90%至100%的工人都加入了總工會。東爪哇的140家碾米廠的7,000個工人都是總工會的會員。總工會的意見在印度尼西亞工人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外國資本家即使不願意，也不得不加以考慮。我們參觀了幾個企業，對於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皇家殼牌石油公司，菲力普斯公司，美孚油公司和大種植園公司的管理處在工會的壓力下不得不允許我們參觀這些企業並和工人們談話。這種情況有時使管理處人員非常難堪，我們參觀丹絨不錄的皇家殼牌石油公司的情形就是一個例子。

在該工廠的廣場上我們受到一個工人代表團和幾名管理處代表的歡迎。管理處的代表們勉強地向我們問好，閒談了一會兒空中旅行，並表示歡迎我們。我們的參觀即將開始。一大羣工人進入了廣場，他們站在一個小行列的前列，剛剛排在管理處代表們的前面，於是開始出發。紅旗在空中悅目地招展着。管理處的負責人走在紅旗的後面。這些先生們汗流不止，也許不只是因為天熱……

“天知道，我們上那兒去”，其中一人對另一人低聲地說。

“我可不知道，”那個人氣憤憤地回答說。

“我也不知道。那是那些工會人員的事情。他們自然知道這裏的路的。”

工會的領袖們確是把路綫仔細地選擇好了。每到有工人正在工作的地方，我們就停一會。工人們放下了他們的

工作，跑來迎接我們，和我們握手，不停地歡呼一直等到我們的小隊伍轉了彎才停止。管理處的代表們似乎並不那麼熱烈。

在那家美國油業托拉斯美孚油公司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格龍河的大煉油廠裏，我們也受到管理處方面的接待。那個美國主管人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在和工人們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議以後，他知道拒絕荷蘭代表團參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作出了下列的計劃：首先由經理們招待荷蘭代表，接着由經理們陪同乘車參觀油田，這樣就結束了參觀的時間。這計劃是由美國經理在我們到達時告訴我們的，工人們知道了這個計劃。

“我們將帶你們參觀油田，”美國經理高興地向我們說，“車子在那裏等着。”

我們告訴他說，參觀油田確是很有興趣的事，但我們是來和工人們談談的，看看他們的住宅，參觀廠內的工會辦事處。

那個美國人匆忙地站起身來，並且急忙地說，“請上大汽車，從這裏走。”

外面成百的工人在等着。工人們擠在我們和經理之間，包圍了我們，並把我們向工會辦事處的方向推去。我們聽見響亮的歡呼聲。那個美國人站在管理人員俱樂部的前面。最後我們看見他的是兩隻揮動的手臂。最後聽見他說的是“請上大汽車。”幾分鐘後，那個美國人和大汽車在稠密的人羣中消失了。

我們和幾百個工人一起穿過了工廠的廣場。到處工人從棚子裏面出來歡迎。我們聽到他們在工廠的很高的設備處高呼“荷蘭工會聯合會萬歲！印度尼西亞總工會萬歲！”我

們參觀了這個公司的工人的可憐的茅棚。在參觀中間，成千的工人齊集在工會辦事處的前面來聽荷蘭代表們的講話。

泗水的一家荷蘭“勃拉特”鋼鐵工廠的工人們去見該廠的經理，告訴他說，接待一個荷蘭代表團對於該工廠是很大的光榮。這個經理回答說，他毫不認為這是光榮，相反地，他甚至沒有夢想到讓工人們為他們的外國參觀者組織招待會。

早上我們到了工廠對面的工會辦事處，一個工人站在門前。此外別無所見。在工會辦事處，有兩個工會領袖歡迎我們。但是，當我們在辦事處呆了五分鐘以後，街道上開始嘈雜起來，工廠的人走空了。一個荷蘭職員想把他們找回去，但沒有成功。所有“勃拉特”鋼鐵工廠的工人——一起有好幾百人——都停了工，離開了工廠來看他們的荷蘭朋友，聽他們講話。狹隘的街道上交通受到了阻礙。工廠的運輸馬車不能前進一步，車夫們必須探身窗外才能聽到外面的聲音。直到一小時以後，工廠的工作才重新開始。這些事情明顯地表示了印度尼西亞工人們對於荷蘭兄弟們的友誼，他們的團結，他們的力量以及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巨大影響。這是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局勢中最重要和最有希望的情況之一。現在，那裏有一個規模巨大的總工會組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只有若干小規模的、時常是非法的工會，在許多國家中找不到類似的例子。這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的源泉。特別在像印度尼西亞那樣的國家裏，和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比起來，那裏有很多的工業和相當多的無產階級。

通過工會運動，大批大批的印度尼西亞工人可以有組織地參加到爭取國家獨立的總鬥爭中去。有一句老話說：

“這對於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交易將發生極不良的影響。”實際上，不只影響到咖啡交易，而且還影響到橡膠、茶葉、糖、錫、石油和鐵礦土等交易。

難怪外國資本家一聽到印度尼西亞總工會這個名字，他們就會發抖。羅姆教授說，印度尼西亞總工會早就應該取消。這是一大危險。在他和他的那些要保持老一套的同事看來，這自然是對的。但是在那些被迫生活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的印度尼西亞工人看來就不是那樣了。印度尼西亞總工會在工人中間享有難以置信的聲譽。工會領袖們到處被當作最好的朋友和最尊敬的客人接待。到處開着門歡迎他們。他們可以到處坐下來用便飯，也許是很簡陋的便飯，這是印度尼西亞好客的風俗。因為這些工會領袖就是幫助工人們為儘量改善生活條件而組織鬥爭、並且關心人民大眾的各種問題的人。印度尼西亞工人們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知道了這一點。

1950年爪哇和蘇門答臘 75 萬種植園工人的範圍廣大的罷工（這次罷工幾乎變成了一個流行的故事），日里的鐵路工人罷工，萬隆的 24,000 名紡織工人罷工，丹絨不錄的碼頭工人罷工，泗水海軍基地工人的罷工都是由印度尼西亞總工會領導的。

茉莉芬事件使總工會犧牲了許多領袖，但是許多青年領袖已經接替了他們的地位。這一點在印度尼西亞總工會的全國代表大會中看得很明顯，許多年輕的工會領袖都出席了那次會議。屬於總工會的工人在過去的漫長而艱苦的鬥爭時期中，獲得了許多經驗。他們看透了右翼政客們常常使用的所謂自由的詞句。沒有一個政黨不裝做贊成完全獨立，反對荷蘭帝國主義，反對外國干涉並贊成印度尼西亞革

命的完成的。甚至連瑪斯友美黨和右翼社會黨的領袖們也都這樣說，可是大家知道，他們是不拒絕外國資本家仁慈地給予的小恩小惠，他們的立場和外國帝國主義的立場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印度尼西亞工人和印度尼西亞一般人民不是輕率的，他們看不到行動就不相信。他們對於時髦的主張，獨立的詞句，懷着一種尖銳的批判精神。印度尼西亞人民深深知道這一點。我們曾經參觀了總工會的公開集會，我們對這一點看得十分清楚。在某一次集會上，一個高級官員（瑪斯友美黨人）要發言。他走上了講台，受到了禮貌的鼓掌歡迎。接着他開始講話。

他的話大致如下：

“我們必須都來爭取我們國家的獨立。”雷鳴般的掌聲，並喊着“對呵！”

“我們的革命還沒有完成。”又是掌聲。

“印度尼西亞工人們必須更勤勞地工作，否則我們將不能獲得自由。”會場中充滿着普遍的歡樂。

“必需有一個更好的勞動紀律。”響亮的笑聲。

“工會運動必須表示更多的責任感。”

這時很難使會場安靜下來了。

“我們的國家必須成爲一個繁榮的國家。”雷鳴般的掌聲。

“所以我們必須把土地交還給外國企業。”

一陣哄堂大笑。整個會場騷動起來了。各方面都插進來說話。

“出賣嗎？”“也許像文諾沙里那裏的繁榮！”那個官員不知道該怎麼說。他開始結結巴巴起來了。

“印度尼西亞總工會必須表示更懂事些。這是一個全國的問題。”

聽衆大笑不止。

那個官員像閃電似地草草結束了他的演說，在聽衆的大聲喊叫中離開了講台。

印度尼西亞工人們看透了那些違反他們國家利益的理論。一切企圖加強或維持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地位的努力都遭到反對。但同時，印度尼西亞工人們願意和任何遭受外國帝國主義壓迫並反對殖民主義的人合作。他們也願意和有着同樣經驗的印度尼西亞民族資本家和印度尼西亞青年組織合作。這就是印度尼西亞總工會和各進步組織的政策。因此，總工會經常和民族資本家舉行會議。我們在日惹參加了這樣一次會議。那次印度尼西亞總工會邀請了 62 位印度尼西亞企業家來談談實際情況。在會中，印度尼西亞小型的紡織廠廠主，製煙廠廠主，日惹銀樓老闆，玻璃廠廠主等都陳述了由於外國競爭者在印度尼西亞所享有的特權而使他們遭受的困難。那個陪着我們在爪哇旅行的工會領袖，矮小的馬都拉人向他們說明了總工會的觀點。他說得非常坦率，一點沒有保留。總工會願意和那些民族資本家合作，並考慮他們的處境，但是決不能犧牲他們企業中的工人的利益。對於這一點是不可能發生誤解的。民族資本家也希望工人有適當的生活，因為這對於他們是有利的，而在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最重要的同盟者。

在爭取提高工資的各種行動中——例如在紙煙工業中——總工會在工人們的同意下要求印度尼西亞企業增加的工資比向外國大企業要求的少。

印度尼西亞工人和資本家雙方都受到殖民地制度之

害。他們有必須加以反抗的共同敵人。

有幾個資本家同意我們那位馬都拉朋友的意見。旁的人依然有些猶豫，不信任，不願意說什麼。但是在印度尼西亞的許多地方，這種資本家已向前邁進了一步，全國各社會階層的團結在共同的行動中表現了出來。印度尼西亞的工會運動的力量使得這種團結得到迅速發展。

最近幾年中，民族運動也由於在印度尼西亞歷史上首次有了大規模的農民協會而加強，這種農民協會在鄉間發展得很迅速，對農民大眾極有吸引力。它們還促成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團結。在那些有種植園的地區，種植園工人工會和當地農民協會密切合作，計劃共同行動，使得工農聯盟日益發展。總工會和農民協會到處保持密切的聯系。

總工會在雅加達舉行大會時，有一大羣農民進入了會場。他們的前列帶着裝滿水果的籃子。這是印度尼西亞農民送給工會大會的禮物，這是會議的高潮之一。工人們和農民彼此擁抱起來。

工農聯盟正在發展之中，正在進行着的實際鬥爭中也是這樣。在城市裏各工廠的罷工期間，農民們把水果、蔬菜、木薯和大米帶到城裏來送給工人。他們彼此支援，預示一個美好的遠景：工農的團結將擊破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

印度尼西亞各方面像暴風雨般進行的巨大發展也影響到印度尼西亞的婦女。婦女組織在反對使婦女解放遲延的封建習俗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主要地還是知識婦女的組織，而現在已發展成爲羣衆的組織，許多工人妻子和農村婦女都參加了。在第二次大戰中這個基礎已經奠定，當時鄉村和村莊中的婦女自動組織起來支援前綫的士兵。她們徵集食物，修補和洗滌衣服，一向

由男人做的工作，婦女也接過去做了。在殖民戰爭的艱難和興奮的日子裏，婦女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也這樣盡了她們的責任。這不但影響到整個鬥爭，並且也影響到婦女本身。那種束縛婦女手足並把她們視爲低等和絕對幼稚的動物，和作爲一種特別用具的嚴酷的封建教條是被取消了。

在鄉村和村莊中，婦女們有了她們自己的組織，自己的任務和意見，並表示在當前的政治空氣中她們應採取的立場。這是一種很大的發展。凡是有組織的地方，就有集會，會議和大會；各階層的婦女開始談論，她們最關心的自然是最迫切的問題。她們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印度尼西亞覺醒婦女會，無疑地，這是最覺悟的婦女的組織；和許多婦女協會相反，這個組織也把工人和農民的妻子組織了起來。

婦女地位的問題在印度尼西亞現在廣泛地被討論着。從政治上來說，這是一個在國內和在國外都討論的問題。大多數的印度尼西亞婦女組織認爲反對一夫多妻制是首要的問題。伊斯蘭教允許男子不止有一個妻子。對於工人和農民，這一點當然沒有什麼意義，因爲在經濟上他們不可能維持一個以上的妻子。但是對於地主、富農和其他富有的人，這是另外一回事；對於這些人，一夫多妻是平常的事，窮苦家庭的年青女子被迫作爲富人的第二或第三個妻子，不問她是否願意，不問她是否喜歡她的未來丈夫，不問她是否反對和其他女子共一個丈夫。地主可以使用強迫的手段。

多妻制對印度尼西亞的婦女來說是不公正的事情。雖然回教和反動的伊斯蘭黨派允許這樣做，但他們的許多擁護者都表示反對。在雅加達，我們遇見了一個瑪斯友美黨人，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他認爲婦女反對多妻制的鬥爭是很合理的。可是印度尼西亞政府是准許多妻制的，在高級官員

養老金的法規中規定了丈夫死亡後第二和第三個妻子的寡婦養老金。這一法規在印度尼西亞曾引起了許多爭論。報紙上登滿了這種爭論，婦女協會組織請願，組織集會和討論會。除了直接在瑪斯友美黨和大地主勢力控制下的婦女組織外，所有的婦女組織都竭力反對這樣的法規。她們毫無顧慮地向各方面宣傳她們的立場，政府對她們感到非常棘手。

婦女組織認為取消和禁止多妻制是實現婦女解放的一個重要和絕對必需的步驟。

反對娼妓的鬥爭也是婦女組織的主要活動之一。普遍的災禍和貧困迫使印度尼西亞婦女操這行可惡的職業。只在丹絨不錄一地就有一萬名娼妓。這些婦女沒有別的活路。凡當一家麻織企業或一個紡織工廠倒閉，娼妓的人數就增加了。好幾個婦女組織正在作反對娼妓的宣傳，它們講述倫理上的道理，並指出這事對於精神和身體的危害。但是印度尼西亞覺醒婦女會還不止於此。它知道這種磨難唯有當印度尼西亞婦女獲得自謀生活的機會時才能徹底消滅。印度尼西亞覺醒婦女會的一般會員對於政治問題都有極堅定的意見，並以改善婦女的生活狀況，改善鄉村中的社會與衛生狀況為目的。

這樣，罪惡才能徹底地根除。

這裏，婦女組織和其他人民組織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系。唯有和其他的組織保持經常的聯系，它們才能達到這一目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鄉村和村莊在爭取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中有許多“村莊協會”或人民委員會，在這些協會或人民委員會中有許多組織參加。在丹絨不錄就有這樣一個委員會，它得到村莊全體居民的支持。

我們在一所很大的竹屋裏看到委員會的委員。屋中整

整齊齊排列着小桌子和板櫈。它像是一所學校。“事實就是這樣”，一個委員告訴我們說。“白天，這裏是學校，晚間就成爲我們的會所。政府不肯建築一所像這樣的房屋，因此我們就自己來造了。我們的孩子們需要一所學校，我們也需要一間村莊居民可以集會的房間。”委員們對於他們自己動手並獲得村莊居民合作而建築起來的學校感到驕傲。但是在這個村莊中工作的委員會和各種組織還做了別的事情。它們改善了衛生情況，堅持要求減低捐稅，組織讀寫班，與愚昧無知作鬥爭，並保衛在村莊中居住的每一個人的利益。

委員會有一個年輕的委員，他熱心地談他們的工作，並希望知道關於荷蘭青年運動的一切情況。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到處遇見像他這樣的印度尼西亞青年。印度尼西亞青年積極地參加民族解放鬥爭，他們知道如何去克服最大的困難。他們大部分是參加過戰爭並在“八月革命”中受過鍛鍊的青年。“八月革命”使他們具有了一種特徵。他們習慣於應付艱難的事情，他們有着堅強的持久力，他們非常關心政治問題。他們對於印度尼西亞革命的不可動搖的忠誠是一個事實。外國帝國主義者很知道這一點；瑪斯友美黨及右翼社會黨爪牙也很知道這一點。

沙里爾的政治生涯的一大部分是用在對付青年的鬥爭上。爲了要求青年不要太猛進，並使他們的革命熱忱和志氣消沉下去，他寫了“我們的鬥爭”一本小冊子。當這些小冊子顯得還不夠的時候，茉莉芬挑釁事件就發生了，這次事件首先要制止青年的有組織的活動。印度尼西亞社會主義青年團受到了可怕的和殘酷的打擊，這個組織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是在革命鬥爭中出了很大的力，並且喚起了參加該組織的印度尼西亞青年爲自由而鬥爭。現在的印度尼西亞人民

青年團有七萬個團員，各島都有它的支部。許多其他的組織也變得更堅強了。可怕的手段都遭到了失敗。

許多年以前，莫爾塔杜力爲了爭取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自由而寫了名爲“馬克斯·哈佛拉”的不朽傑作。他在該書中描寫賽加的父親的水牛被偷去、阿丁達的父親被趕出自己的耕地，並從出生地巴杜爾逃亡的故事。賽加和阿丁達是兩個青年，他們對於生命懷有幻想，他們彼此相愛，但是他們兩人都在荷蘭殖民軍隊的刺刀下犧牲了。

從那時以後已經過了許多年了。但是在印度尼西亞仍有許多賽加和阿丁達在活着。只是情況改變了。他們和往日的賽加和阿丁達不同了。他們團結在組織中，他們學習，他們不會再受壓迫了。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壓迫他們了。

整個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情形也是如此，他們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長。爭取自由的感情一旦被喚起，就不可能再加以摧毀，在完全的自由沒有得到保證以前是不可能加以制止的。有些人認爲這是一種嚇唬人的魔鬼，但對千百萬印度尼西亞人說來，這是他們繼續鬥爭到底的力量的源泉。

幾年以前，荷蘭資本家會說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印度尼西亞的火山上，這滋味是不好受的。人民的組織的發展，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日益獲得人心，民族團結的加強，印度尼西亞工人集體罷工的反響，反對荷蘭軍事代表團的示威，主張收回西伊里安的運動——到處的隆隆聲表示火山沒有熄滅，新的爆發即將到來。這次爆發是不可避免的，也許是最後一次。那時，紅白色的國旗將在羣島上空自由地飄揚，印度尼西亞人民將建立一種新生活。這些日子是不遠了。

九 和阿末的會見

在我們的附近，我們看見過他好幾次。他是爲我們安排一切並陪同我們到各處去的那批工會人員之中的一個。在棉蘭的盛大集會中，他坐在第一排，他注意地聽着，做了許多筆記。每遇我們參觀一個企業的時候，他都在場，並且總是和工人們在一起。我們處處都看見他的瘦小身影出現。

我們的譯員用手指着他告訴我們說，“他以前是一個游擊戰士”。我們從他的聲音中就能夠聽出對於那位矮小而樸實的爪哇人的崇敬。這位爪哇人在蘇門答臘似乎有許多朋友。

以後，我們聽到更多的關於他的事。他是從東爪哇來的。他是那裏的一個很大的游擊隊的領袖，並且曾有一段很長的時期坐在牢裏。

這點就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願意找一個晚上和他安靜地談談。在使人疲乏的多峇湖（這湖甚至比教科書上和俾特克斯對它的描寫還要美妙）之遊以後的一個晚上，我們坐在旅館房間門前籐椅上休息的時候，就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

他自我介紹說，“阿末”。他的姓名的下面一部分說得很含糊，我們聽不清楚，他也許是故意這樣的。我們給他找了一張椅子，請他和我們坐在一起。他只能說不完整的英語，用荷蘭語交談似乎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必須費一點心思。這是我們唯一交談的工具，但是已足以互相了解，有時還作些手勢來解釋。

阿末用一種詢問的態度望着我們，他問道：“今天，你們覺得高興嗎？”他指的是什麼？我們沿多峇湖的遊覽呢？還是我們對固特異種植園工人的訪問呢？那是今天的兩件大事。我們要告訴他我們對這兩件事的印象。

因此，我們談到風景優美的湖邊住宅區，我們所看見的在湖上漂浮的小船，清澈蔚藍的湖水，那些知道如何獨佔最美麗、最適於健康地方的外國人的豪華別墅，陡峭的小山，和帶有急彎的曲折的汽車路。

當我們談到風景的時候，阿末注意地聽着。他對於他的國家的美麗和富饒很感驗激，他告訴我們種種瑣細的事情，如果他沒有向我們說，我們一定會把這些事情忽略了。他對於棉蘭周圍的地方似乎知道得很清楚。他談到這個地方的情形，談到山林的形勢，非常熟悉。有一次他在沉思後說：“那個地方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隱蔽的地方”，這就顯示出他是一位能幹的有經驗的游擊戰士。

這個能忍受各種艱難困苦の有頭腦的人一定是殖民軍的一個危險的敵人。他好像對每件事都考慮得很週到，他似乎能够忍受生命的艱苦和鬥爭的挫折，並且能够克服它們而不會喪失他的自制力。他慢吞吞地回答問題，他要費一些時候思索一下。這是許多印度尼西亞人所具有的良好特性。

“我們的譯員告訴我們，你曾經是一位游擊戰士。”阿末等了一會，然後說：“對的，我曾經是一支 150 人的隊伍的領袖。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對我們的敵人的軍隊進行武裝鬥爭。這並不是因爲我願意做一個戰士，而是因爲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

阿末向前注視着。他好像沉入了夢境。

他突然說：“我是一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我是

一個共產黨員”。他說這句話的語調是很嚴肅的。

“我們的黨一直遭遇到很大的困難。但是，凡是為民族自由而奮鬥的人，情形都是相同的。

“我的家鄉是東爪哇的新埠頭，我的父親是那裏的鄉村學校的教員。有許多貧農住在村子裏。土地貧瘠，生活的鬥爭是很艱苦的。農民辛辛苦苦生產的一點東西都被地主與重稅所奪去，這些重稅是為外國人而徵收的。

“在戰前的年代中，我的父親被流放到帝姑島，他在那裏患瘧疾而死。他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啊，不是的……。他是一個很溫和的人，他對荷屬政府仍然存有希望。他加入了反法西斯組織印度尼西亞國民運動黨，這個組織是要保衛印度尼西亞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並為印度尼西亞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但是，在那時，這已經是一種犯罪的行為！

“仇恨荷蘭人——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當我們聽到我的父親死在帝姑島的消息時，這種仇恨就增加了十倍。那時，我不知道有兩種荷蘭人，也不知道我所恨的是荷蘭帝國主義，荷蘭帝國主義壓迫我們，同時也壓迫你們。

“日本人來的時候，我還在學校讀書，在他們所謂的初級中學裏。日本人進行反荷宣傳並裝做替印度尼西亞人帶來自由。我不很了解這種宣傳。有些青年人相信了這種宣傳。許多青年人被迫參加青年組織，這些組織用的是印度尼西亞名字，但是受日本人的領導。嗣後，在所有企業和學校中都成立了分部，我們也受了軍事訓練。

“但是，日本人走進了陷阱，他們的槍對準了他們自己。我們從經驗中知道日本人不是為了印度尼西亞人而作戰的，他們和荷蘭帝國主義者一樣，想壓迫我們的國家。最初，這是一種模糊的感覺。在我認識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裏的

一位朋友後，我才很清楚地認識了這一點。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位朋友，我非常感謝他。他是一位純樸的農民，他唸書和寫字都是靠自學的。他和我們那個地區很活躍。我仍然記得我們在一條寂寂的鄉間小道上第一次會面的情形……。他把我介紹給在幾個地區組織抗爭運動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團體。我成爲這些團體之一的會員。我學到了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我的國家雖然已經獲得自由的，窮人不必甘心忍受他們的貧困，有一種新爲帝國主義的制度是我們一切困苦的原因，以及世界上到處都有人和我們持同樣的想法並且是我們的朋友。我第一次聽到了革命理論。這些革命理論也許並不是全部表達得很正確，但是無論如何，已使我對這些理論加以思索。我沒有留在新埠頭，而到泗水的一個工廠裏去作工。我学到了許多新的事情，我第一次參加了一次行動。我們聽到被日本人捕去的沙里佛汀將從瑪琅被解往泗水去處死的消息。因爲戰爭快要結束了，日本人想拿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最優秀的子弟共產黨員沙里佛汀來洩憤，但是日本人把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了。這個消息像閃電般地傳遍了泗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號召所有的人進行抵抗，並且把這個驚人的消息通知全國。泗水居民以青年人爲前導，向這個城的出入要道行進，封鎖了所有的道路以及鐵路，交通全部停止。汽車和火車都受到檢查。這種情形繼續了好幾天。日本人被制住了，他們宣佈不會把沙里佛汀處死。那時，他們唯一確信的是：人民同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它的一位領袖——沙里佛汀。

“共和國宣佈成立的時候，我參加了軍隊。當英國人力圖在泗水登陸的時候，第一次戰鬥發生了。這是一場惡戰，許多人戰死，但是英國人被迫撤退了。和許多別的青年人一

樣，我留在軍隊裏。生活是不正常的。我從泗水到日惹，又從日惹到梭羅不斷移動。天天都有新的聳人聽聞的消息，出其不意的攻擊、挑釁，時而失敗，時而勝利。在萊莉芬挑釁事件期間，我被逮捕並監禁在日惹。這個事件是荷蘭與美帝國主義者周密準備和組織的一次恐怖運動。平民黨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在這次事件中充任了帶頭人。他們不放過任何攻擊印度尼西亞爭取自由的戰士的機會。第二次殖民戰爭使我有機會越獄並且重返前線。在正式停火之後，我爲了避免再度遭受逮捕，不得已逃到外門各縣。在那裏，我開始在工會中工作。現在我們最重慶的工作是組織農民與工人，和其他爭取民族自由的團體合作，並促成民族團結。這就是我們目前所作的事！你們在旅行中，或者會看到這樣的一些工作。”

時間已經很晚了。街上很冷靜，旅館的客人們都睡覺了。守夜的服務員來了好幾次，很焦急地問道：“你們不去睡覺嗎？”

但是，我們還不想去睡覺。

阿末是一個很健談的人。他有和諧的音調，他說英語帶一點爪哇語的重音。這一種的談話使我們有了許多可以思索的題目。我們聽到許多有趣的事。當阿末開始談到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時候，他便滔滔不絕。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以及整個民族運動和它一起要走的道路確實是很艱苦的。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剛剛成立後，荷蘭殖民政權便以它所有的武器來對付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共產黨立即遭到禁止，荷蘭政治情報機關的特務麇集在它的周圍，它必須忍受猛烈的攻擊。它雖然很年輕，它在狂風暴雨之中却屹立不動。在荷印總督府的內部，他們深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存在對於殖民制度的巨大危險。略有一點

政治知識的人便可了解共產黨的活動會引起整個民族運動的復活。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被迫在地下工作，其他的民族團體與政黨，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一樣，也只能部分公開存在。帝姑島的瘧疾和霍亂病成爲荷蘭殖民政府對付民族運動所常用的王牌。在1927年的起義中，印度尼西亞人民大規模反抗壓迫的運動發動起來了，這次起義失敗之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袖慕梭不得不流亡國外。1936年，他潛返印度尼西亞並在國內住了一年，從事準備反法西斯的鬥爭。從那時起，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把它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當時日本法西斯正準備侵入它非常垂涎的印度尼西亞。

但是，在日本軍隊侵入了印度尼西亞之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仍然積極活動。它着手組織抵抗運動，這種抵抗運動在五年中發展成爲一種遍及全國的運動。

日本人的仗打得越來越壞。在中國的東北，蘇聯軍隊神速地向前推進，整個戰綫像紙糊的房屋一樣地崩潰了。在太平洋中逐步奪取日本陣地的時期已經告終。戰事的發展加速了並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的崩潰。爲了保全還能保全的東西，日本的最高統帥部把軍隊從印度尼西亞運走。運輸艦一艘接着一艘地開走了。羣島上的佔領軍越來越少。隨着軍隊的開走，便也不可能對廣大島國作有效的軍事上的控制。因此，燃燒起來的民族抵抗運動再度獲得了機會。在日本政府被迫投降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印度尼西亞人民知道如何加以利用的真空。美國人正忙於中國問題，英國人首先注意他們“自己”的殖民地，而荷蘭政府則單獨不能作出任何事情來。革命運動像燎原之火一樣地燒遍了整個印度尼西亞。像大火一樣，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無法控制的了。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宣佈成立，革命成爲事實。這是一個長期艱苦戰鬥的開始，這一戰鬥可以繼續許多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在日本佔領期間一樣，它現在也是站在爭取印度尼西亞的自由與獨立的戰爭的前列。這個偉大的目的過去支配了而且現在仍然支配着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政策。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爲了實現它的目的，願意和其他民族團體與政黨合作。在反對海牙圓桌會議協定——在革命暫時遭到失敗之後，外國殖民集團，尤其是荷蘭殖民集團，利用這個協定繼續它們對印度尼西亞的統治和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剝削——的鬥爭中，這種合作確曾實現過。在這個羣島的好些地方，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印度尼西亞國民黨都實行合作；這兩個組織曾經好幾次聯合聲明，它們將開始對回教國運動恐怖匪幫採取行動，它們並且一起要求廢除海牙圓桌會議協定。在印度尼西亞國民黨與其他黨派的內部，有許多政治領袖開始了解，彼此間的激烈衝突和反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鬥爭是極不利於民族解放鬥爭的，他們也了解，如果他們繼續這樣下去，對於印度尼西亞將產生惡劣的後果。有幾個曾受外國資本家競爭與控制之苦的民族資本家表示準備爲了共同事業而和其他民族力量合作。這種情形在印度尼西亞議會中也表示出來。的確，在議會中不只是共產黨人而且印度尼西亞國民黨與其他政黨的議員都發言贊成廢除海牙圓桌會議協定。有時採取了聯合行動。在議會中時常提出反對履行圓桌會議協定的各種措施的議案。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議會內外支持韋洛坡內閣，但是並沒有放棄它的批評與宣佈它自己的原則的權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支持韋洛坡內閣，對的！但是同時，他們並沒有忘記在議會中以及利用民主報紙——如，“人民日報”與“紅星雜

誌”——來糾正韋洛坡的立場，如果他們認為這種立場是和印度尼西亞國家的利益不相符的或者對印度尼西亞工人和農民會產生惡劣的後果的話。民族資本家佔重要地位的韋洛坡內閣爭取不受荷蘭殖民者干涉的各種努力都受到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鼓勵。但是，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和瑪斯友美黨却注意其他的問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當印度尼西亞社會黨領袖沙里爾的著作“倫理冥想錄”在印度尼西亞知識分子中很為流行的時候，他是很有得意的，並且也很成功地裝做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但是，一旦發現到沙里爾的倫理學是以荷蘭殖民者的實事求是的打算為根據以及他的“倫理冥想錄”表現為與商業有關的嫌疑的時候（在雅加達謠傳，他是好幾個大貿易公司的一個電影院的老闆，並且他是好幾個外國資本家的好朋友），他的聲望就喪失了，他的好運像冬天的寒暑表的水銀柱一樣地下降了。任何人都不再重視他對外國和印度尼西亞記者的許多次接見——這些接見都沒有受到重視，只引起人們的冷笑而已。但是，在國外，有人却力圖把沙里爾重新放在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舞台上。

但是，印度尼西亞社會黨不放過任何阻撓韋洛坡政府的機會；在內閣內外都有一種企圖增加外國殖民國家在政府中的勢力的鬥爭。我們必須根據這種情形來看前國防部長日惹蘇丹的行動。許多年來他就和沙里爾有密切關係，他並且一直被荷蘭政府認為是一個“積極人物”。在他任部長的期間，這位積極人物盡量任用封建分子。這些分子都是忠於荷蘭政府的，並且身居高位，可以按照殖民地的習慣來指揮陸軍。他認為，以前皇家荷印軍的軍官是陸軍的核心。在“合理化”的口號之下，他把真正的民族分子免了職。這位蘇丹很感謝荷蘭軍事代表團給他的幫助。他不願激烈的攻擊

而在議會中爲荷蘭軍事代表團辯護。當然，批評是一定逃不了的。在這位蘇丹對人民所憎惡的荷蘭軍事代表團公開表示同情的時候，曾在前共和國軍隊中服役的陸軍中的士兵越來越表示不滿。因此，在議會中有人提出了批評國防部長的政策動議。辯論繼續很久。有人提議改組軍部，但是仍然同樣遭到批評。最後，梭菲安的議案^①便提出來了，這個議案對批評作了解釋，爲議會所通過。但是，事情並未就此結束。幕後有荷蘭殖民分子撐腰的印度尼西亞社會黨認爲現在已經到了執行仔細策劃的推翻在雅加達的議會的時候，他們可以出擊了。

關於這件事，阿末有許多話要說，那天夜裏我們可以記滿一整本的筆記簿。

但是，我們也可以告訴他一些詳細情形，因爲在這些日子裏，我們離這場事變比他更近。

在梭菲安議案通過之後，雅加達有許多謠言。印度尼西亞社會黨要對議會發動猛烈的攻擊，圖謀不軌的軍官將試圖奪取政權。我們對這種謠言有些懷疑。但是，有一個向來消息靈通的印度尼西亞政客警告我們，不要過於忽視這種謠言。他認爲，反叛的軍官們反對議會的行動可能發生。但是，第二天當我們去到泗水的時候，一切似乎都很安靜，我們帶着安寧可保的想法離開雅加達。但是，我們在泗水得到了旁的消息。

陸軍中支持蘇丹的人，曾在荷蘭軍事代表團領導之下工作的軍官，組織了一次“叛亂”。10月17日早晨，發生了反對議會的示威遊行：軍人、蘇丹的黨羽或被軍官強迫參加的士兵、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分子，以及被士兵在雅加達街上

^① 梭菲安議案係關於改組軍部的提案。——譯者

趕在一起的一大羣人(士兵給他們旗幟並強迫他們一起走)都到了議會大廈。這所大廈受到猛烈的攻擊，門被打破了，有些惡棍開始瘋狂地搗毀了所有的東西。幾小時之後，反叛的士兵和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徒被驅散了，事情也就結束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號召全國的力量來保衛議會和人民的民主權利並擁護政府，反對這個受外國勢力所鼓動的陰謀。然而，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却企圖在爪哇與蘇門答臘各地組織同樣的反對議會的示威遊行。但是，這次也證明失敗了。印度尼西亞社會黨進行煽動，並竭力鼓動雅加達大學學生(印度尼西亞社會黨在大學中的勢力仍然很大)舉行示威遊行，但是也沒有成功。學生們保持鎮靜，他們看穿了這個計劃，並且拒絕參加反對議會的運動。在各處都舉行了保衛議會的集會。好些政黨包括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內，發表聲明，它們不贊成對議會的攻擊並呼籲人民有所警惕。很多部隊着手撤換追隨蘇丹的指揮官。這一外國策劃的反對印度尼西亞議會和旨在使印度尼西亞軍隊更牢固地被掌握在殖民者手中的企圖失敗了。

當我們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阿末笑了。“將來的情形會完全一樣的。現在，我們對我們的敵人有了一些認識。他們並不是取捨分明的。只有當你知道如何作有力的還擊的時候，他們才尊重你。那就是和他們進行談判的唯一基礎。”

在對付外國人所領導的陰謀叛亂的軍官與政客的聯合行動中，印度尼西亞的民族力量彼此更爲接近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決心增進這種合作，並且實現一個真正的民族統一戰綫。但是，這一團結民族力量的過程仍然在進行中，現在只是開始。

阿末問道：“你們在荷蘭也有同樣的問題嗎？”但是，我

們沒有時間答覆這個問題、我們談得離開多峇湖很遠了。我們甚至不能夠告訴我們的朋友關於我們訪問固特異種植園工人的情形。

但是，我們雖沒有談到訪問情形，我們却作了一次我們將牢記在心並決不會錯過的這次談話。

當阿末離開我們的時侯，天快要亮了。正和千百萬從事於解放他們國家的其他的人一樣，他有很多的事要去做。

當我們回到房間準備去睡幾小時的時候，我們聽見敲門聲。

阿末又來了。

“啊！我忘記了一些事。如果你們要在荷蘭報紙上發表關於你們的旅行的文章的話，不要忘記給棉蘭寄幾份來。”

我們答應了。我們怎能忘記阿末呢？

十 荷蘭人——朋友與敵人

在巨港附近的一個橡膠種植園中，印度尼西亞的荷蘭朋友和荷蘭敵人在那裏面對面地站着。一個荷蘭種植園老闆和他的職員們在那裏接待我們，他們陪同我們參觀橡膠園，陪同我們到鄉村中將舉行的集會去。

這是一個爲人所痛恨的種植園老闆，他的職員在人民羣衆間也有極壞的印象。

他們坐在前面寬大的安樂椅中。

他們聽着我們向種植園工人講話。我們講到荷蘭工人爲了幫助印度尼西亞爭取自由而進行的鬥爭，講到1946年阿姆斯特丹的大罷工，講到比埃·范斯泰凡蘭和蕭霍夫^①

的士兵。他們唯一的表示是諷刺的強笑。但是，當我們說到荷蘭帝國主義依然壓迫印度尼西亞人民，同樣也在壓迫這個種植園的工人時，他們就不做聲了。聽衆們對我們所說的這幾句話報以熱烈的掌聲，並插嘴表示贊成。在這時候，那個種植園老闆站了起來，笑着說：“我不願意再參加這個會了。”接着他在表示抗議中離開了會場。他的職員們跟隨着他。他們不得不在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中從稠密的人叢裏擠出去。種植園工人們親眼看見他們的敵人也就是我們的敵人，他們親眼看見兩種荷蘭人面對面在這裏站着。

“這是我們第一次遇見從荷蘭來的朋友。”那個對我這樣說的種植園工人很表感動。“現在我們知道，你們也是在和我們的敵人鬥爭。因此，我們在荷蘭不只是有敵人。你們先別走，讓我們大家都和你們拉拉手。”橡膠種植園中也許從來沒有過像那天下午那樣親熱的握手。

在荷蘭，關於所謂印度尼西亞人不與外國人，特別是荷蘭人往來的所謂“名言”，曾有過許多無聊的話。這種政治上的酒醉謬語已爲事實所揭穿了。我們到處受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熱烈接待。成百件禮物要我們帶給荷蘭工人們。從開始到結束，我們一直受到難以推却的懇動的招待。

印度尼西亞人民非常關心荷蘭的情況。在我們的旅行中，我們好幾百次——在口頭上或書面上——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比埃·范斯泰凡蘭現在怎樣？他的牢房有多大？牢房是什麼樣子？允許他接見訪問者多少次？荷蘭工人們對我們的鬥爭怎樣看法？荷蘭爲什麼有四個工會？荷蘭工人們對蘇斯霍夫的看法怎樣？荷蘭學生們是不是支持我們的爭取

① 籠雀夫是荷蘭拘禁囚犯的一個地方。被拘禁在那裏的士兵曾暴動反對把他們送往印度尼西亞去。——譯者

自由的鬥爭？荷蘭有沒有娼妓？婦女運動有什麼反對娼妓的舉動？戰爭宣傳很多嗎？工資和物價的關係怎樣？”

他們提出了無窮盡的問題，希望我們給予認真的答覆。有人對敵人會那樣關心嗎？印度尼西亞人民並不仇恨外國人，也不仇恨荷蘭人。這是很明智的作風。但是對於那些去壓迫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外國人和荷蘭人，他們是深惡痛絕的。

我們從荷蘭得到了兩個印度尼西亞學生在阿姆斯特丹被捕的消息。這引起了印度尼西亞全國的憤怒。這種憤怒並不是針對那些是印度尼西亞的朋友的荷蘭人，而是針對那些要在印度尼西亞維持殖民勢力的傢伙。

在我們居住的那條蘇多摩街上，有一所學校的牆上貼着抗議逮捕印度尼西亞學生和要求廢除“圓桌會議協定”的傳單。印度尼西亞人民尤其憎恨設在雅加達的荷蘭軍事代表團和乘着吉普車或華貴的轎車在城中疾馳的荷蘭高級官員。雅加達人民把荷蘭軍事代表團稱為荷蘭諜報人員（兩者的簡寫都是 M. M. B.，這裏不需要諜報人員。荷蘭帝國主義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傳統敵人，但是荷蘭工人階級却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傳統盟友。

印度尼西亞人民對於這種聯盟是非常重視的，他們認為這是爭取勝利的決定性的條件。許多印度尼西亞人認為，而且他們也時常對我們那樣說，自由的印度尼西亞和自由的荷蘭的合作對兩國都是有利的。對荷蘭來說，這意味着工商業有很遠大的前途，因為它們可以從印度尼西亞購買大量的原料和產品。對印度尼西亞來說，這意味着將獲得發展國家所需要的技術和經濟的幫助。印度尼西亞人民並不懷疑像弗朗斯·古德哈特要我們相信的那些外國人和合作，

但是他們却反對實行殖民地計劃的外國人並反對實際上要使印度尼西亞經濟受外國控制的那種合作。

印度尼西亞人民知道，荷蘭人民的鬥爭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自由的事業是有幫助的，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鬥爭對於荷蘭人民的鬥爭也是一樣。印度尼西亞工人和整個民族運動的力量不僅加強了我們對印度尼西亞的爭取自由的鬥爭的信心，而且也加強了我們對荷蘭工人階級勝利的信心。

荷蘭帝國主義靠了它對印度尼西亞的殖民地剝削制度而維持它最後的一分力量。這種制度的基礎已在動搖。荷蘭帝國主義的力量是建築在沙土之上的。

今天我們啓程回荷蘭。

在雅加達的瑪腰蘭飛機場，有一個印度尼西亞婦女向我們走來。她把我們拉在一邊，送了我們一件小而貴重的紀念品。

“我要謝謝你們。你們的訪問印度尼西亞對我們有很大的教育。我要下決心來做一點事情……”

“你要下決心？”我們覺得很奇怪。

“是的，在你們來到這裏以前，我說我不相信還有和壓迫我們的荷蘭人不同的荷蘭人。因此我說我沒有和你們打交道的必要。我的丈夫和你們所有的朋友都說這種觀點是錯的，並說，我應該參加集會，聽你們講話。在表示了許多次的反對以後，我終於這樣做了。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關於比埃·范斯泰凡蘭和關於你們的鬥爭的事情。現在我才明白我們是在進行着一種共同的鬥爭，荷蘭人和荷蘭帝國主義者是不一樣的。我們彼此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敵人也沒有什麼不同。”

她和我們拉了拉手，並要她的孩子們叫我們：“叔叔”。

“自從我聽到你們講話以後，我馬上參加了婦女運動，成了‘印度尼西亞覺醒婦女會’的會員。”

飛機場的播音器叫着我們的名字。

去阿姆斯特丹的飛機隨時就要起飛了。

我們不得不終於告別。

飛機順着跑道開始行駛。我們的朋友們向我們揮着手。他們人數很多，他們一直陪着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全國旅行。在這三個月中，他們教我們愛他們的國家。

我們昇到了空中。我們又經過丹絨不錄，又看到了為永遠靜止的爪哇海岸的屏障的“千島”全景。飛機的發動機隆隆地響着。印度尼西亞留在我們的後面：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偉大的民族。……

它什麼時候才獲得自由呢？

